

三彩朱雀俑　1224年　殘高33.3公分
四川華鎣安丙墓出土





盤蛇形人首、獸首俑　1224年　高9.15、7.8公分
四川華鎣安寶孫墓出土



墨書「仰俑」、「伏聽」瓷俑　1118年　高18、5公分　江西南豐出土

臺灣大學



人首鳥身俑　1094年　高30.6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墓出土



捧日文官俑　1118年　高28公分
江西南豐出土



綠釉「下帳」明器模型　1086–1094年　四川廣漢雒城出土　作者拍攝

臺灣人

DOI: 10.6541/TJAH.202603_(60).0002

唐三彩陶俑何處去
——論四川宋墓的京兆源流與唐宋明器變革

許雅惠*

【摘要】來自儒家經典的明器，在唐、宋之際出現轉折，盛極一時的陶俑隨葬風氣在晚唐衰微了，華北墓葬罕見陶俑。經由系統性整理出土宋墓，本研究發現陶俑雖不見於華北宋墓，但在四川、江西、福建仍普遍可見，四川更是宋代三彩陶俑的中心。從四川宋墓出發，本文追蹤中晚唐長安葬俗移植四川的情況。首先從唐、宋禮制規範可知，明器仍為葬禮所需，當華北改用紙明器時，四川持續使用陶俑，顯示出對於傳統的固守。其次分析四川陶俑的類型與來源，其中以唐代關中因素最為突出，成都的鎮墓真文券更說明從長安向四川的人群移動。最後結合墓誌，討論墓葬所見與文獻所載玄宗、僖宗入蜀的關聯，釐清這兩波移民如何塑造、重塑四川的喪葬傳統。

關鍵詞：明器陶俑、鎮墓真文券、買地券、墓誌、唐宋變革

高大精美的三彩陶俑是盛唐高級墓葬的標誌，尤盛於兩京地區。《開元禮》與《唐六典》稱包含三彩在內的陪葬陶俑為明器，而且明確規範使用者的身分，官品越高，數量越多，尺寸也越高。盛極一時的三彩陶俑隨葬風氣在九世紀的晚唐衰微了，進入北宋，官方仍沿襲唐、五代的制度規範，不過考古墓葬顯示宋代陶俑的使用大為限縮，包含長安與洛陽在內的華北墓葬多已不見。①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① 早在上世紀七〇年代，矢部良明便指出晚唐三彩以各類器皿為主的現象，參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三彩〉，《考古學雜誌》，65卷3號（1979），頁1-36；謝明良，〈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學美術史論集》，第5輯（1985），頁3-209；謝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收入氏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85-117；謝明良，〈唐三彩的區域性消費〉，收入氏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119-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唐入宋，明器陶俑在華北式微了。進入蒙元時期，高級墓葬再次出現數量龐大的陶俑。這些陶俑多為灰陶或黑衣陶器，集中分布在陝西西安一帶，而且種類與造型與唐代陶俑有相似之處，似乎是唐代傳統復興的結果。② 唐、宋制度所規範的明器陶俑陪葬隊伍，在宋代真的消失了嗎？或者仍保留在兩京以外的地區？經由系統性地整理出土宋墓，本文發現陶俑雖不見於華北地區，但在四川、江西與福建的墓中仍普遍可見，特別是四川的陶俑有些表面還罩三彩釉，是宋代三彩陶俑的分佈中心。從陶俑出發，本文追蹤中晚唐長安葬俗移植四川的情況，並結合墓誌中的移民線索，分析來自關中的幾波移民如何塑造、重塑四川的喪葬傳統。

一、唐墓中的三彩陶俑

以人俑隨葬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秦漢以後成為傳統葬俗的一部分，材質以陶、木居多。唐代繼承北朝、隋代，不但以大量敷彩陶俑隨葬，更出現三彩鉛釉陶俑，以鮮麗的黃、綠、褐釉流淌出奔放淋漓的效果，成為盛唐氣象的代表。考古所見最早的三彩陶俑來自河南洛陽鉅鹿郡太夫人魏氏墓（687年），魏氏丈夫王雄誕，地位崇高，官正三品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柱國宜春郡開國公。③ 制度規定列侯死後，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王雄誕卒，其子襲封宜春郡公，魏氏先後加封太君、太夫人。④ 魏氏墓的主室被盜，四個壁龕保存尚稱完好，共出陶俑222件，包括人物俑95件、騎馬俑61件、動物俑60件，是目前出土最多三彩陶俑的唐代墓葬（圖1）。

② 袁泉，〈洛渭地區蒙元墓隨葬明器之政治與文化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10期，頁61-78。

③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3期，頁15-29。

④ 魏氏墓誌見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頁27-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七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是三彩陶俑的流行高峰，各品官員皆使用，無官的豪富之家亦可使用。⑤ 一至三品的高級官員墓如前述魏氏墓。四、五品中級官員墓如河南洛陽栗特人安菩墓（709年），出土111件三彩與單釉器，其中人與動物俑超過90件，墓主官正五品上定遠將軍；⑥ 陝西西安獨孤思貞墓（698年），出土超過130件三彩陶俑，墓主官朝議大夫行乾陵令上護軍公士，正五品下。⑦ 六至九品的下級官員墓亦可見三彩俑，如陝西西安姚無陂墓（697年），21件陶俑中有19件為三彩，墓主為平州司倉，正八品下。⑧ 不過下級官員墓中似以加彩陶俑為多，如河南偃師杏園M1928李嗣本（607–675）墓，葬於709年，官寧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墓中陶俑數量大、品質精美，但皆為素燒加彩，三彩器僅有高足盤。⑨ 這些下級官員多為地方官吏，如縣令或輔佐縣令的吏員。⑩ 庶民墓也有三彩陶俑，如河南偃師張思忠墓（703年），墓主終身無官，被盜後追回的三彩俑約30件。⑪

李唐皇室也是三彩明器的主要使用者，可惜這些社會金字塔最上層的墓葬皆遭盜擾，隨葬情形不明。目前所知，七世紀後期已見三彩器，但多為器皿，如陝西醴泉陪葬昭陵的趙王李福墓（672年）與太宗妃燕氏墓（672年），所出皆三彩瓶罐。⑫ 稍晚的湖北鄖縣新安郡王李徽墓（684年）所出亦為三彩器皿，有瓶、盂、龍首杯、角杯。⑬ 器皿以外，陝西富平虢王李鳳墓

⑤ 關於唐三彩的使用階層，見謝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頁85-117。

⑥ 參隨葬器物登記表，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170-175。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5。

⑧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唐姚無陂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12期，頁72-81。

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93。

⑩ 齊東方，〈唐代縣令墓研究〉，《古代文明》，2010年，頁220-254。

⑪ 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南偃師縣隋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11期，頁994-999、993。

⑫ 關於這幾例早期三彩器的討論，見謝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頁85-117。

⑬ 湖北省博物館、鄖縣博物館，〈湖北鄖縣唐李徽、閻婉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8期，頁30-4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75年）出土三彩床榻，是最早的三彩明器模型。⑭ 至八世紀，三彩陶俑已普遍見於太子與公主墓，按年代先後有陝西西安懿德太子墓（706年）與永泰公主墓（706年）、⑮ 陝西富平節愍太子墓（710年）、⑯ 陝西西安章懷太子墓（711年）、⑰ 陝西西安陪葬昭陵的越王李貞墓（改葬於718年）。⑱

唐代三彩明器陶俑的陪葬以兩京地區為中心，高度與數量受到官方制度規範，從初唐至盛唐體積有加大趨勢。類型包括俗稱鎮墓獸的帶角蹲踞怪獸、武士俑、天王俑、文武官俑、樂舞侍俑、牽馬牽駝儀仗俑等。陝西、河南之外的華北、華東、華中諸省份，遼寧、甘肅、寧夏、內蒙古雖可見三彩出土，但多為器皿，陶俑與明器模型的數量有限，應屬不同的「明器文化圈」。⑲ 從胎土與風格特徵判斷，有些兩京之外的陶俑及模型與陝西、河南非常近似，應該來自兩京。⑳ 以風格而言，兩京地區早期的陶俑造型清瘦，唐玄宗開元年間轉為豐滿，可能受到山西長治地區陶俑的影響。㉑

---

⑭ 富平縣文化館等，〈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7年5期，頁313-326。

⑮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懿德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174-220；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64年1期，頁7-33。

⑯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唐節愍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20-131。

⑰ 發現六百多件隨葬品，含三彩陶俑，具體數量不明，見陝西省博物館等，〈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7期，頁13-25。

⑱ 發現一百三十多件隨葬品，含三彩陶俑，具體數量不明，見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貞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10期，頁41-49。

⑲ 明器文化圈的概念來自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原載《藝術學》，14期（1995），頁47-76，後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31；又見謝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頁85-117；出土唐三彩的墓葬與遺址列表，包含中國及域外，見謝明良，〈唐三彩の諸問題〉，頁178-209。

⑳ 謝明良，〈唐三彩的區域性消費〉，頁119-153。

㉑ 小林仁，〈唐代盛唐婦女俑考——女性イメージの成立と展開〉，發表於「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史之亂後，包含三彩在內的陶俑變得罕見，厭勝的鐵豬、鐵牛興起。㉒三彩陶俑在初、盛唐之際崛起，晚唐消失的原因為何？㉓有學者注意到制度規定與晚唐墓葬間的矛盾，也就是墓葬隨葬品很少，甚至顯得簡陋寒酸，但制度面卻一再強調對厚葬之風的節制。㉔齊東方認為這是因為晚唐喪葬觀念改變，凶禮重點從豐厚的地下埋葬轉為炫目的地上展示，更加重視喪禮的鋪張排場，加上紙明器出現，取代部分陶明器，以致晚唐墓葬令人有簡陋寒酸的錯覺。陶俑的沒落可在此脈絡中理解，是喪葬觀念轉變的一環。㉕

進入北宋，首都所在的河南地區基本不見陶俑，一般認為這是晚唐以來紙明器取代陶、木明器的結果。㉖但明器俑並未就此消失，反而在一些地區出現鮮明的特徵，在江浙有木俑，在四川有胎質粗鬆的三彩陶俑，在富含高嶺土的江西有瓷俑，在福建有壽山石俑。由此可知，紙明器的流行並沒有完全取代傳統的陶木明器。明器俑受制度規範，有傳統的固守性，然實際使用時富有彈性，可依時依地調整表現形式，以符合現實條件。有鑒於明器俑受到官方制度規範，以下先梳理唐、宋明器制度並歸納發展趨勢。

二、唐宋明器制度

明器也作盟器、冥器，經典來源是先秦的三禮。《禮記・檀弓》引孔子說法，謂明器是喪葬專用，不具實用功能，自古便有，如送葬泥車與草紮人

㉒王仁波，〈西安地區北周隋唐墓葬陶俑的組合與分期〉，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428-456；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鐵牛鐵豬〉，《中原文物》，2007年1期，頁72-79。

㉓程義曾整理關中墓葬的隨葬品，但表中收錄的唐早期三彩俑有些錯誤，有的是黃釉或白釉俑，也有些並沒有出土三彩俑，如見程義，《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75-184。

㉔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年1期，頁59-82。

㉕徐胭胭，〈媒介的競爭：唐三彩與唐代墓葬制度〉，《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4輯（2017），頁229-241。

㉖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94-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俑：「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㉗《禮記・檀弓》又說「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㉘再次解釋明器是專為死者所設，與生人之器有別。明器於喪禮中陳列，見於《儀禮・既夕》「陳明器」一節，出殯時隨死者入壙，經常置於耳室或壁龕。㉙

以先秦禮書為典範，唐代對明器的規範更明確，見於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成書的《大唐開元禮》（以下稱《開元禮》）與二十七年（739）的《唐六典》。二部開元禮書分別取法《禮記》、《周禮》，成為上追周代之禮的里程碑。㉚下面這條經常被引用的《開元禮》規定，具體涵蓋明器的總數、類型、尺寸（以下引文底線皆為作者所加）：

> 凡明器，三品以上不得過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駝馬及人不得過一尺，餘音樂、鹵簿等不過七寸。
> 三品以上，帳高六尺，方五尺，女子等不過三十人，長八寸，園宅方五尺，奴婢等不過二十人，長四寸。
> 五品以上，帳高五尺五寸，方四尺五寸，音聲僕從二十五人，長七寸五分，園宅方四尺，奴婢等十六人，長三寸。
> 六品以下，帳高五尺，方四尺，音聲僕從二十人，長七寸，園宅方三尺，奴婢十二人，長二寸。

㉗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9，頁172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㉘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卷8，頁146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㉙ 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清乾隆盧文弨輯刊本，抱經堂叢書），卷13，頁5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㉚ 關於《大唐開元禮》與《唐六典》的編纂與實施，參吳麗娛，《禮與中國古代社會：隋唐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68-91；關於《開元禮》的喪禮制度與儀節研究，參邱衍文，《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北：郁氏印書及獎學基金會，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三品以上優厚料，則有三梁帳，蚊幬帳，婦人洗梳帳，竝準此。㉛

九品官員分為三等，各陪葬不同數量的明器（附表一）：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種類含動物俑、人俑與縮小的模型。動物俑有四神與駝馬；人俑有女子、音聲僕從、奴婢；模型有園宅。

《開元禮》提到的帳應為下帳，即以絲織品製成的帳幕。不同品級官員用的絲不同，婦人用五彩絲，如《唐六典》記載：「五品已上用素繒，六品已下用練，婦人用綵」。㉜ 有學者認為下帳源自墓室設奠的傳統，以帷帳營造墓主之位。㉝ 此外，下帳內可放置明器人偶，營造出侍奉的空間，如《舊唐書》載李勣（594–669）向家人交代後事時，要求備置下帳，內部只放十個木人：「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皁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㉞ 李勣墓於昭陵陵園被發現，可惜破壞過甚，原來的陪葬情況不明。㉟ 出土唐墓中，陝西醴泉鄭仁泰墓二號天井下的東壁龕有帷帳痕跡，周圍有男立俑環繞，近於《舊唐書》描述，可能便是放置明器人偶的下帳。㊱

㉛ 蕭嵩纂，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72），「序例下・雜制」，卷3，頁34。

㉜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8，頁508。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㉝ 程義，〈談唐代喪葬文獻中的「下帳」〉，《中國文物報》，2011年7月22日，第6版；何月馨，〈隋唐墓葬出土帳構研究〉，《中原文物》，2016年2期，頁94-100。

㉞ 劉昫撰，《舊唐書》，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67，頁2489。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㉟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3期，頁3-14。

㊱ 陝西省博物館等，〈唐鄭仁泰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7期，頁33-42。關於「便房」（即考古中的壁龕）中的下帳，見張蘊、秦造垣，〈淺談「下帳」〉，《考古與文物》，2009年6期，頁46-48；劉昭慧，〈試論唐墓壁龕與它的喪葬禮儀的功能〉，《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3輯（2015），頁185-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元禮》還提到園宅，應是縮小的田園宅第模型。代表出土例證如西安中堡村唐墓的三彩院落，由大門、假山、亭、正房、廂房等構件組成。㊲《開元禮》這條規定所羅列的下帳、園宅、各種人俑及動物俑，共同構成唐代上層階級的陪葬內容。

根據《唐六典》，明器由甄官署供應，如下面這條廣被徵引的史料所示。條文明列動物俑與人俑的類型、高度與材質：

> 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壙、當野、祖明、地軸、擬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玩，各視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為之，其長率七寸。㊳

此處提到音聲僮僕，以陶、木製成，高七寸。這些侍僕俑在古代墓中經常可見，河南鞏義唐墓出土不少帶「奴」字墨書的陶侍俑，明示是奴婢，武士俑也有帶「奴」字墨書的。㊴

至於《唐六典》的「當壙、當野、祖明、地軸、擬馬、偶人」，應即前引《開元禮》的「四神、駝馬及人」。所謂四神——當壙、當野、祖明、地軸——具體造型引起不少學者關注。王去非首先結合唐墓出土品指出，當壙、當野是立於墓口兩側的一對武士俑，祖明、地軸則是跟在後方俗稱鎮墓獸的一對帶角怪獸，四者合稱「四神」。㊵ 後來河南鞏義唐墓出土了二件墨書「祖明」的陶雙角鎮墓獸，證實此說有道理。㊶ 與祖明配對的地軸造型

㊲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60年3期，頁34-38。其他出土或徵集的唐三彩園宅模型例證，見呼嘯，〈唐代三彩庭院的初步研究：從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徵集三彩庭院說起〉，《南方文物》，2022年2期，頁285-290。

㊳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23，頁59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㊴ 張新月等，〈鞏義出土的唐代題字俑〉，《中原文物》，2007年2期，頁81-87。

㊵ 王去非，〈四神、巾子、高髻〉，《考古》，1956年5期，頁50-54。

㊶ 張新月等，〈鞏義出土的唐代題字俑〉，《中原文物》，2007年2期，頁86。陝西長安醴泉坊唐三彩窯址也曾出土鎮墓獸殘塊，上刻有「祖明」，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長安醴泉坊三彩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何？唐代沒有出現題名作「地軸」的陶俑，只有一件鞏義出土的墨書「地吞」陶臥獸，置於墓門內正中處。[42] 墨書「地軸」最早例來自高句麗廣開土王永樂十八年（408）朝鮮德興里壁畫，在雙人首蛇身形象一旁有墨書「地軸一身兩頭」（圖2）。元代廣東海康的雙人首蛇身磚刻亦有「地軸」榜題，由此二例可確知地軸為雙人首蛇身造型。[43] 參閱《宋史》可知，《唐六典》這段文字可能有闕文，兩件鎮墓獸應為「祖明、祖思」較合理。[44]

根據身份等級，官員得用的明器種類、數量、大小各有等差，但並非一成不變，從盛唐到晚唐有變化。明器屬於葬禮行列的一環，與儀仗器用相搭配，整體受到朝廷節制，由鴻臚寺司儀署負責，盛唐規定見於《開元禮》與《唐六典》，整理如附表一、二。[45]《唐六典》的葬禮隊伍包含轜車、引、披、鐸、翣、挽歌、方相魌頭。轜車是載柩之車，也寫作輀車、輛車，品官的轜車上方可罩覆幃幔「幰」，根據官品，兩側可畫龍或雲氣，垂掛的流蘇數隨官品有等差。轜車周圍有引、披、鐸、翣，「引」又稱「紼」，是牽引轜車前進的繩索；「披」繫於轜車四周，便於手執穩定左右；「鐸」是鈴鐸，「翣」是羽扇，皆為人員手執的儀仗。北宋初年聶崇義考訂漢唐禮圖重編的《三禮圖》有「柳車」之圖，可供揣想唐代的轜車裝飾與引、披、鐸、

---

[42]「地吞」俑的出土位置，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4。

[43] 曹騰騑、阮應祺、鄧杰昌，〈廣東海康元墓出土的陰線刻磚〉，《考古學集刊》，第2期（1982），頁171-180。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德興里高句麗壁画古墳》（東京：講談社，1986），頁75，寫真12。

[44] 脫脫等撰，《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124，頁2909-2910。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1年3月17日）。程義曾整理唐墓陶俑的數量、尺寸等，復原《唐令喪葬令》內容，亦指出《唐六典》可能有脫訛，參程義、鄭紅莉，〈《唐令喪葬令》諸明器條復原的再檢討〉，《中原文物》，2012年5期，頁79-86。

[45] 鴻臚寺司儀署負責凶禮儀式的進行與喪葬之具的供給，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4，頁119；卷18，頁50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翼隊伍（圖3）。[46] 至於方相與魌頭則負責驅逐惡鬼，頭戴四目或二目面具，身著青衣朱裳，執戈揚盾載於車上。

晚唐憲宗元和六年（811）刑部尚書兼京兆尹鄭元針對這些喪葬條文進行修訂，見於《唐會要》，整理如附表三。比較盛唐、晚唐規定，隨葬品的類型皆為明器（含四神）、園宅、下帳。其中園宅與下帳的高度可達五、六尺，想必引人注目，唐禮中一直保有其尺寸規定，是唐代重要的隨葬品。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時僅見於晚唐規定，《開元禮》與《唐六典》皆不見，這與兩京地區的考古情況吻合，說明十二時或十二生肖俑應流行於盛唐之後。[47]

隨葬明器的數量也歷有修訂，整理如下表一。《開元禮》成書後不到十年，開元二十九年（741）便下令縮減明器數量，並規定材質「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48] 這道規定顯然效果不彰，元和六年又改回《開元禮》舊禮數，三十年後的會昌元年（841）敕旨數量繼續增加。

---

[46]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1175印本，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19，頁1。關於《新定三禮圖》的編纂與現存宋、元版本考訂，見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臺大歷史學報》，第60期（2017年12月），頁57-117。

[47] 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故宮學術季刊》，第3卷第3期（1986），頁59-105；齊東方，〈唐代縣令墓研究〉，頁220-254。

[48]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38，頁693。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唐禮的明器數量規定

官品	732開元禮㊾	741開元敕令㊿ *	811元和詔令(51)	841會昌敕旨(52)
三品以上	九十	七十	九十	一百
五品以上	六十	四十	六十	七十
九品以上	四十	二十	四十	五十
庶人	無文	十五	十五	二十五

* 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

明器數量在晚唐會昌年間達到高峰，但並未持續。五代後唐天成二年（927）討論喪葬儀制時，各品級官員准用的器用與數量又回到811元和詔令。(43)

後唐長興二年（931）再次修訂制度（附表四），此次修訂的幅度較大。(54) 首先是官品的等級劃分，《開元禮》與《唐六典》的九品三等為：一、二、三品為一等，四、五品為一等，六至九品為一等。唐憲宗元和三年（808）重申此等制。(55) 長興二年的修訂將品官分為四品以上、五六品常官、七品常參官、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准用的明器數量也大為減少，五、六品常參官只能用三十事，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更只有

㊾ 蕭嵩纂，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序例下・雜制」，卷3，頁34。

㊿ 王溥，《唐會要》，卷38，頁693。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51) 王溥，《唐會要》，卷38，頁69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52) 王溥，《唐會要》，卷38，頁697-698。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53) 王溥，《五代會要》（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8，頁10a-13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54) 脫脫等撰，《宋史》，卷125，士庶人喪禮，頁291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55) 王溥，《唐會要》，卷38，頁69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五事，與庶人的十二事相距甚微。[56] 長興二年修訂可見五代的二個發展：一是准用的明器數量整體大幅減少，另一是低階官員與庶人的數量差距變小。

北宋建國後，太平興國七年（982）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此次修訂基本沿用後唐長興二年（931）詔。[57] 之後續有纂修，保留至今的有北宋仁宗朝《天聖令》與徽宗朝《政和五禮新儀》，以及南宋寧宗朝《慶元條法事類》，比較此三部禮典令式，可見兩宋明器制度的變化。

藏於天一閣的《天聖令》為明抄孤本，原有三十卷，現殘存最後十卷，共十二篇。每一篇令文分前後兩部份，前半為「因舊文以新制參定」，後半為不行之令文。[58] 仁宗天聖七年（1029）編成，十年（1032）與《附令敕》、《天聖編敕》一併鏤版施行，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頒行《元豐令》之後就不再行用，實際施行五十多年。現存第二十九卷為〈喪葬令〉，內容只有挂鬲、銘旌、輀車、引披鐸翣挽歌等葬儀器用規定，沒有明器，整理如附表五。比較《天聖令》與唐、五代規定，在掛重、銘旌、輀車的使用上，與《唐六典》基本相同（附表二）。[59] 在品官的引披鐸翣方面，只有四品以上的規制沿用唐代，五品以下的數量都減少了，挽歌人數也較唐代減少，與五代長興詔大致相同。

北宋後期徽宗大規模改革禮制，於政和元年（1111）纂成《政和五禮新儀》，成為兩宋最具規模的官修禮書，被研究者視為禮下庶民的一代禮典。[60]

---

[56] 唐正建指出有別於唐代喪葬令著重高級官員，五代奏敕特別重視檢校官等低級官員與庶人，見唐正建主編，《《天聖令》與唐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477-489。

[57] 脫脫等撰，《宋史》，卷125，士庶人喪禮，頁291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58]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高明士曾檢討諸學者對天一閣本《天聖令》版本研究，參高明士，〈「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漢學研究》，第31卷第1期（2013），頁69-99。

[59] 仁井田陞原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頁760-761。

[60] 宋徽宗敕編，鄭居中編纂，《政和五禮新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張文昌研究唐宋禮書，稱之為「禮下庶民的一代禮典」，見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198-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二十四「序例」條列各品官員喪葬之制，整理如附表六，具體的喪儀程序則詳列於全書末六卷。南宋的《慶元條法事類》將通行的敕令格式分門別類以供官員檢閱引用，與前述唐、宋法典禮書有別，是一部實用性的工具書。[61] 該書纂成於寧宗慶元二年（1196），隔年頒布，在喪葬類「服制格」下，保留了品官與庶人的禮數規定，整理如附表七。比較附表六、七可知，《政和五禮新儀》與《慶元條法事類》的喪葬規定完全相同，只有二至五品官員的輦數不同，一為七十二、一為七十六，應是抄寫筆誤，可知南宋時期基本遵循徽宗政和朝制定的新禮。

將《政和五禮新儀》與盛唐《開元禮》、《唐六典》比較，可看出宋代喪葬禮儀的新趨勢。首先，九品三等的劃分改變。唐禮的三等是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九品以上，五代長興詔開始鬆動，北宋政和新禮則改為一至四品一等，五、六品一等，七至九品一等。在銘旌、紼披鐸翣、挽歌、明器的規範上，都根據這個原則。此變動意味由唐入宋，品官的禮儀身份向上提升了，四品官從中等上升為上等，六品從下等升為中等。禮儀身份雖然提升了，但禮儀器用的數量卻大為減少，以明器為例，唐代三等官員依序可用九十、六十、四十事，政和禮改為五十、三十、二十事，數量減少約一半。其次，宋代三等官員間的數量差距也較唐代縮小許多，唐代上、下等的數量相差高達五十，宋代縮減為三十，級距明顯縮小。

明器類型方面，《政和五禮新儀》與《慶元條法事類》均只列「明器」這個大項，沒有包含的類型。不過司馬光（1019–1086）《書儀》記載：「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62] 此處已不見唐代的音聲樂舞，僅保留車馬、侍從、僕人，且手執奉養之物，更強調日常侍奉的功能。宋墓出土的磚雕或人俑亦多見持巾、盆、鏡、盒等侍奉器具，與此紀錄相合。至於唐代相當重視的園宅與下帳，北宋

[61] 王德毅，〈關於「慶元條法事類」〉，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頁1-7。

[62] 司馬光，《溫公書儀》，百部叢書集成（據清嘉慶學津討原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7，頁7a-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年尚可見，後蜀孟昶（919–965）薨時，葬禮有「黃白紙帳、園宅」。[63] 此後，園宅在《宋史》、《宋會要》及官修禮書便不復見，下帳一詞雖然還使用，但意義已經改變。[64] 唐代下帳指絲織品製成的帳幕，宋代下帳則是「床帳、茵席、倚桌之類」的傢俱模型，而且「皆象平生所用而小也」。[65] 從高達五、六尺的絲帷帳變成小型陶木明器模型，下帳的內涵轉變，視覺效果也大不如前。

宋代明器的數量與尺寸減小，意味制度規範的禮數排場不如以往，此現象也見於最能展示喪禮場面的出殯行列。《政和五禮新儀》的出殯次序是：鹵簿鼓吹（二品以上有鹵簿鼓吹、三品有鹵簿）、靈車、方相或魌頭車、誌石車（九品無）、大棺車、明器輿、下帳輿、吹米輿、酒脯醢輿、食輿、銘旌、纛、鐸、挽歌、輀車。載柩之車——輀車——是葬禮行列的壓軸，跟在輀車後方的是喪家主人及諸子，按喪服順序排列。[66] 唐禮各品官員輀車都有塗油的幃幔「油幰」，政和新禮要八品以上才有，九品至庶人無；牽引棺柩的「紼、披」與手持「鐸、翣」儀仗的人數也較唐代減少，挽歌人數亦然。整體顯示宋代葬禮的禮數不若唐代隆重，制度中的葬禮隊伍較唐代縮短。然而制度規範不是全部，喪禮還包含制度未及的民間葬俗，如《書儀》批評世俗多信喪葬業者之說，以裝飾華麗的大木製成裝載棺柩的輦車，只為誇耀觀者，以致有些不能出入大門，很不必要。[67] 此部分牽涉的流俗因時、因地差別甚大，非本文所能論。

中國傳統的禮儀規範包含禮制與儀式，禮制以材質、數量、尺寸規範等級身份，儀式規範行禮程序，兩者互為表裡，透過具有展演性的禮儀，建立社會身份的等差秩序。由唐入宋，禮數趨於簡約，意味儀式排場縮減；三等官員之間禮數差距縮小，也代表上下身份的區隔較不顯著。明器陶俑作為官

---

[63] 脫脫等撰，《宋史》，卷162，頁2910。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7日）。

[64] 劉未，〈南陵宋墓與士人葬儀〉，《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4年7期，頁86-100。

[65] 司馬光，《溫公書儀》，卷7，頁7b。

[66] 宋徽宗敕編，鄭居中編纂，《政和五禮新儀》，卷216，頁6。

[67] 司馬光，《溫公書儀》，卷8，頁1b-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喪葬禮制的一環，比較唐、宋禮書的制度差異，有助於掌握長期的發展趨勢。綜觀中國古代明器，唐代是發展高峰，以絢爛奪目、樣式眾多的加彩或三彩陶俑為代表，晚唐步向衰落，宋代陶木俑數量大減、體積減小、製作粗略，體現了唐宋之間喪禮的轉變。[68]

需說明的是，前述唐、宋制度分析雖暗示出殯場面盛況不若以往，但這只是制度的精神、朝廷的理想，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理論與實踐之間必有落差。官方制度規範以三禮的古典要素為核心，而喪葬實踐與喪家的宗教信仰、財富狀況、地方習俗等有密切關係，必須同時考量個人、宗教、社會等因素才能有較全面的認識。

三、外地移植的四川明器陶俑

傳統陶木明器在晚唐式微，出土量銳減，與唐代禮典所見的上升趨勢正好相反（表一），紙明器的使用是一大原因，宋代情況如何？本研究全面整理各大考古期刊發布的遼宋金墓葬，總數4905筆（不計漏澤園），出土陶、木、石俑的有260筆。宋墓俑類主要出土自四川（154筆）、福建（25筆）、江西（21筆），其中四川的出土量遠遠超過其他省份。需說明的是，資料建檔原則上以墓為單位，但考古報告資料不足時只能以墓地為單位，因此文章統計的資料筆數不等於墓葬數，實際墓葬數會稍高於資料筆數（統計的原始資料見附表九）。

表二分別統計兩宋、北宋、南宋的紀年墓與當中隨葬陶俑的資料筆數與佔比。這些紀年墓通常規模較大、隨葬品較豐富，墓主的社會地位應該較高。以兩宋整體來說，四川有半數的紀年墓都隨葬陶俑，比例最高。從北宋到南宋，以資料筆數來說，四川、福建、江西三省隨葬俑的數量都上升了，四川的增加尤其明顯；以比例來說，江西的北、南宋相差不大，但四川與福建的佔比都明顯提高了。

[68] 上世紀鄭德坤已有此觀察，見鄭德坤、沈維鈞，《中國明器》（北平：哈佛燕京社，19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紀年墓隨葬陶俑情況

省份	兩宋紀年墓筆數	兩宋紀年墓出土陶俑	北宋紀年墓筆數	北宋紀年墓出土陶俑	南宋紀年墓筆數	南宋紀年墓出土陶俑
四川	124	62 (50%)	41	17 (41%)	83	45 (54%)
福建	26	5 (19%)	7	1 (14%)	19	4 (21%)
江西	103	16 (16%)	46	7 (15%)	57	9 (16%)

深具唐代特色的三彩俑入宋後情況如何？遼國境內與北宋華北地區仍然燒造不少三彩器用，如：盤、壺、枕等，甚至大型三彩塑像，如知名的河北易縣遼代三彩羅漢像，但墓中已不見三彩陶俑。目前所見三彩俑全數出自四川與陝西兩個省份，若納入單色的低溫褐、綠釉俑，一共有將近六十座墓。其中陝西僅4座，全數出自與四川交界的漢中，此地是往來陝、川的必經之道。[69] 換句話說，四川不但是兩宋陶俑隨葬最盛的地區，而且是三彩陶俑的中心。四川的邛崍窯於晚唐開始燒造三彩器，不過多只是器皿或玩具般的小陶偶。[70] 兩宋四川不但盛行以陶俑隨葬，還出現不少三彩俑，顯示出與唐代繼承的關係。

五代後蜀時期，四川便已出現成套陶俑陪葬，如成都雙流徐公夫婦墓（妻葬於939年、夫964年）與彭山宋琳墓（952年），兩座磚室墓皆出買地券，年代明確。[71] 這些陶俑都沒有上釉，以徐公夫婦墓為例，包括：武士

[69] 這四座出自劉長源，〈漢中市北郊石馬坡南宋墓清理記〉，《考古與文物》，1984年5期，頁56-62；李燁、周忠慶，〈陝西洋縣南宋彭杲夫婦墓〉，《文物》，2007年8期，頁57-70；漢中市博物館，〈漢中八里橋水庫清理一座宋墓〉，《文博》，1989年1期，頁42-43。

[70] 謝明良，〈唐三彩的區域性消費〉，頁119-153，邛窯三彩見頁151-153；《四川古陶瓷研究》編輯組編，《四川古陶瓷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李知宴，〈論邛窯彩繪瓷的藝術風格〉，收入耿寶昌主編，《邛窯古陶瓷研究》（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頁25-31。

[7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雙流縣文物管理所，〈成都雙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後蜀雙室合葬墓〉，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23-363；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四川彭山後蜀宋琳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5期，頁18-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俑、侍女俑、生肖文官俑、匍匐俑、伏聽俑、寫實豬首人身俑（考古報告稱為「地精」）、神怪鳥、雙人首蛇身俑、陶鼓、陶狗、陶雞（圖4）。丈夫所在的墓室（M2）保存完好，可見俑在墓內的放置相當有規律：成對的石武士俑置於買地券前方的入口兩側，生肖文官俑置於內部左右三組壁龕內，男女侍俑與神怪俑皆置於墓室後龕。後龕一側有一條通道連接妻子墓室（M1），匍匐俑臉朝內放在通道口。除了豬首人身俑與陶鼓，其他均為唐代已出現的類型。

入宋後四川持續以成套陶俑陪葬，素燒陶俑之外，也有施單單色、雙色或三彩的釉陶俑。紀年墓中年代較早的是彭山江漬鄉程氏夫婦墓（1068年），有買地券，夫婦墓室皆出素燒陶俑，種類與前述五代徐公夫婦墓大致相同。[72] 年代較早的三彩陶俑見於成都蒲江的王□湜與史氏大娘夫婦墓（1072年），二人墓室皆出買地券，釉陶俑種類相當豐富，除了常見的文武官、侍者、動物、十二生肖、陶鼓等，還有馬首人身俑、鳥首人身俑、鮫魚俑。[73] 最奇特的是一組捧日、月、星的寬袍人形神俑，捧物上分別陰刻「日」、「月」、「星」三字（圖5），為之前未見。

具有宋代特色的四川陶俑，還見於成都新津王府君夫婦墓（1081年），雙室磚墓中的西室保存良好。[74] 報告說陶俑表面施加黑褐色陶衣，修整平整、光亮，不確定是否為褐釉。陶俑的種類眾多，有些在底座上有刻款，除了文武官俑的「文」、「武」，還有刻著「萬歲女」體態豐腴的女立俑，及手持念珠的「老人」女立俑。值得留意的是，在一件頭戴幞頭的豬首人身俑底座刻著「地精」二字（圖6），該俑造型與刻「文」的文吏俑相似，著寬袍，雙手握於胸前。四川另有一類豬首人身俑頭部作寫實豬形，不戴幞頭，有時也被稱為「地精」，兩者是否相同還有待確認。此外，王府君墓還出土四合院明器模型一座，應為唐代禮典中的「園宅」。

---

[72] 劉志巖，〈四川彭山正華村宋墓發掘取得重要收獲〉，《四川文物》，2008年4期，頁95-96。

[73] 陳顯雙、廖啟清，〈四川蒲江縣五星鎮宋墓清理記〉，《考古與文物》，1986年3期，頁37-47。

[7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新津縣鄧雙鄉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384-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宋時期四川隨葬陶俑的風氣更盛，種類與造型大體承襲北宋，表現相當格式化。整體而言，製作較粗糙，細節有時模糊。這些特點似乎說明，來自傳統葬儀的明器陶俑活力大不如前，成為新意無多的形式化存在。較具代表性的紀年墓皆出自成都，且多隨葬買地券，如：錦江區宋天成夫婦墓（1136年）與成華區孫公賈氏夫婦墓（1147年）的加彩灰陶俑、[75] 二仙橋衛氏夫婦墓（1152年）的素燒陶俑、[76] 青龍鄉陳氏四娘夫婦墓（1213年）的褐綠釉陶俑、[77] 金牛區劉公夫婦墓（1235年）的釉陶俑。[78] 類型包括武士俑、文武俑、侍俑、狗、雞、匍匐俑、仰觀俑、雙人首蛇身俑、豬首人身地精俑、陶鼓、陶獨腳獸等。

南宋晚期數量最大、品質最高的一批陶俑出自華鎣安丙家族墓地，包括葬於1224年的高級將領安丙（1148–1221）與葬於1265年的妻子李氏（1141–1219）及鄭氏（?–1264）。[79] 三座石室墓的後龕雕刻墓主坐像，兩旁有侍者，四壁浮雕精美的武士、文吏、伎樂、四神等。隨葬多三彩陶俑，除了重複墓壁的武士、文吏、侍者之外，還有十二生肖動物與四神。較為特殊的是，安丙墓的十二生肖與四神俑皆擬人化，作坐姿武士造型，座前有立體的

[7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錦江區沙河堡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379-41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成華區成華廣場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694-714。

[76] 王仲雄、王軍，〈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211-22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考古》，2004年5期，頁55-64；章紅梅，〈〈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釋錄校補〉，《考古與文物》，2015年3期，頁103-106。

[7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石嶺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397-417。

[78] 馮先成、程遠福、張丙奎，〈成都市外化成小區南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242-25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外化成小區唐宋墓葬的清理〉，《考古》，2005年10期，頁47-56。

[7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物象徵（圖7），有別於墓壁的四神浮雕。[80] 也許是因為盜掘，墓地中混合人形與動物造型的神怪俑數量稀少，造型較特殊的有安寶孫墓（1224年）所出、被稱為伏羲女媧的二件盤蛇形人首、獸首俑（圖8）。[81]

歸納四川兩宋明器陶俑的類型，大致有三：一是人俑、動物俑、日用模型，這些倣自日常生活的侍者、家畜、樓倉等，是為了服侍死者所設，來自《禮記》等經典，屬於古典明器，漢代以下常見。二是十二生肖俑，經常作文官造型；三是包含武士俑在內的神怪俑，常作人與動物混合造型。生肖俑與神怪俑來自民間信仰，功能之一是護衛死者不受上下邪精侵擾，透過喪葬墓儀而產生效力。北宋官修的《地理新書》與宋金民間流行的《大漢原陵秘葬經》（以下稱《秘葬經》）充斥著各種墓神與厭勝墓儀的描述，可見這類思想之盛行。《秘葬經》的〈盟器神煞篇〉還圖示天子、親王、公侯將相至於庶人墳墓中的神煞安置法，是討論造型奇特的神怪俑時最常被援引的文獻。[82]

這三類明器陶俑在唐代皆已成為喪葬禮俗的一部分，但有著明顯的地域差異。兩京地區以第一類古典明器為主，以大量的侍俑、文武官俑、騎馬俑呈現盛大排場。墓口有一對鎮墓獸與武士或天王（圖9），亦可見匍匐俑，唐中期之後加入十二生肖俑，但罕見其他神怪俑。神怪俑最早出現在六世紀的北朝，於山東淄博崔氏墓地出土了雙人首蛇身的地軸以及十二生肖陶俑，有研究者將這些形象追溯到漢畫像。[83] 隋、唐時期陸續出現造型奇特的人首鳥身俑（圖10，有稱觀風鳥）、雙人首龍身俑（圖11，有稱墓龍）、人首魚身

[8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圖版66-69、46-47。

[8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圖版135。

[82] 徐蘋芳首先有系統比對墓中陶俑與《秘葬經》記載，見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1963年2期，頁87-106；劉未，〈實物、圖像與文本：宋元時期的墓葬神煞〉，《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1期，頁59-80。

[83] 沈睿文分析北朝神煞俑與婁睿墓壁畫，認為形象來自漢畫像，見沈睿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收入氏著，《墓葬中的禮與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49-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俑（圖12，有稱儀魚）等。[84] 主要出土自兩京地區以外的北方，如遼寧、河北、山西、兩湖等。其中遼寧、河北、山西出土的七至八世紀上半例證特別受到關注，有認為是北朝以來的北方地方性葬俗，從遼寧向西、南傳播，也有人持相反意見。[85] 湖南隋唐墓也曾出土一批包含鎮墓獸在內的神怪俑，造型特殊，經常與十二生肖俑共出，是這種組合的早期例證。[86] 其中十二生肖俑經常置於墓室壁龕中，造型頗富特色，除人形立姿外，也常見獸首人身坐俑（圖13）。

唐代西南地區的十二生肖與神怪俑，目前似僅見於重慶萬州永州刺史墓。[87] 該墓被稱為駙馬墳，嚴重盜擾後仍出土一批青瓷俑與模型，包括：武士、文武吏、奴婢侍者、伎樂、鎧甲騎兵、牽馬牽駝、牛、雞、鴨、案、磨、房屋、棋盤、硯、人首鳥身、獸首人身跪坐十二生肖。墓內左右各有三個小耳室，青瓷明器便出土於前部的左右兩耳室。墓中有一方文字漫漶的墓誌，有「貞觀六年（632）除澧州刺史……遷永州刺史」等字，可知為初唐墓葬，發掘者查閱地方志考證墓主為冉仁才。考古報告提到該墓結構與湖南長沙近

---

[84] 張勛燎、白彬曾整理隋唐至元墓出土的神怪俑並討論其演變，見張勛燎、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與道教〉，收入氏著，《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冊6，頁1611-1750；近來關於唐墓神怪俑的整體發展，參張永珍，〈唐墓地軸的再認識——兼談唐代鎮墓俑組合〉，《四川文物》，2022年4期，頁68-76。

[85] 齊東方認為神怪俑是北方葬俗，見齊東方，〈中國北方地區唐墓〉，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編，《7-8世紀東亞地區歷史與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8-15。吳炎亮根據墓葬年代，認為由遼寧朝陽往周邊傳播，吳炎亮，〈試析遼寧朝陽地區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文物》，2013年6期，頁50-56；盧亞輝從唐初建國集團對遼寧地區的經營，認為由山西往東傳播，盧亞輝，〈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軸的考古學研究〉，《四川文物》，2020年5期，頁88-100。

[86] 關於湖南出土神怪俑的整體討論，見徐斐宏，〈論兩湖地區隋唐墓葬出土盟器神煞的構成與變遷〉，《南方文物》，2024年2期，頁154-169。近來盧亞輝提出異議，將這批隋唐墓的時代向下拉，認為是玄宗之後，此說尚待檢驗，見盧亞輝，〈論兩湖地區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考古學集刊》，第27集（2022），頁176-200。

[87] 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萬縣唐墓〉，《考古學報》，1980年4期，頁503-514。關於四川唐代墓葬的形制與隨葬品分期研究，參劉雨茂、朱章義，〈四川地區唐代磚室墓分期研究初論〉，《成都考古研究》，2009年，頁515-5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郊唐代磚室墓類似，有左右耳室或壁龕以放置隨葬品，而且青瓷陶俑胎質近似於湖南的窯口，與四川瓷窯明顯有別，應為外來品。初唐永州刺史墓應為特例，不能代表川西的情況。

直至五代，四川才又見大量明器俑隨葬，且種類與樣式固定，成為頗具特色的地方發展，從中可看到唐代南、北不同地域因素交會。[88] 十二生肖俑經常放在棺室左右壁龕中，與湖南唐墓類似；神怪俑的類型則與唐代北方較接近，包括匍匐俑、仰觀、伏聽、雙人首蛇身、神怪鳥等。雙人首蛇身多為一男一女，應稱為地軸，已如前述（圖14）。仰觀、伏聽皆作文吏裝扮，仰觀為坐姿或立姿的抬頭俑，伏聽則為臉轉向一側的匍匐俑（圖15），唐代沒有這類陶俑的榜題，但江西南豐北宋政和八年（1118）墓出土者有「仰俑」、「伏聽」墨書，可確定其名稱（圖16）。[89] 神怪鳥南、北皆有，作人首鳥身，有稱觀風鳥或人面鳥，漢墓已見，北朝至隋唐墓多一男一女成對出現，也有一女面、一鳥面成對者。[90] 從南朝畫像磚與前述五世紀初朝鮮德興里古墳壁畫榜題，可知應是「千秋」、「萬歲」（圖17）。[91] 四川宋墓多只出一件，意涵應已改變（圖18）。至於常見的雞俑與狗俑，在唐代兩京似為尋常家畜，一墓可出多件，至宋代多只出一雞一犬，江西南豐桑田北宋墓出

[88] 四川宋墓的形制與隨葬品分期整理及與其他地區的相互影響，見陳雲洪，〈四川地區宋代墓葬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頁279-304。

[89] 唐山，〈江西南豐宋墓出土瓷器與南豐窯〉，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02-105；江西省博物館，〈南豐縣北宋政和八年墓〉，收入《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22-151。

[90] 耿超曾整理此類器物的特徵與出土情況，見耿超，〈唐宋墓葬中的觀風鳥研究〉，《華夏考古》，2010年2期，頁112-119。關於此類器物的造型特徵、燒造地點、與流通範圍，見謝明良，〈隋唐墓出土的陶人面鳥〉，《故宮學術季刊》，39卷1期（2021），頁1-38。

[91] 徐蘋芳稱為觀風鳥，見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收入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1995），頁277-314；王去非，〈隋墓出土的陶「千秋萬歲」及其他〉，《考古》，1979年3期，頁275-276。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德興里高句麗壁画古墳》，頁27（圖版30）、76。王銘，〈唐宋墓葬中的千秋萬歲鳥與觀風鳥的不同形象辨析、歷史來源及象徵意義〉，《江漢考古》，2014年1期，頁94-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者有「金雞」、「玉犬」墨書，可知是墓儀神煞。[92] 可能是《秘葬經》中鎮守幽宅的金雞、玉犬，也有研究者視之為風水吉地的象徵。[93]

四川宋墓還出現一些以往不見的神怪俑，造型多混合人與動物，包括：豬首人身、鳥首人身、馬首人身、牛首人身、雞首人身等，白彬認為這些俑與雷神信仰有關，是五方雷神的表現，是道教雷法盛行的產物。[94] 此說還有待檢驗，首先，四川宋墓的動物首人身俑多個別出現，未曾有五方雷神共出。其次，前述成都新津的戴幞頭豬首人身俑有「地精」銘文，可知不是雷神。最後，北川縣北宋墓曾出土一件三彩豬首人身坐俑，大耳、長嘴、赤裸上身，頭頂陰刻「王」字，應該也不是雷神（圖19）。[95]

宋代新出現的神怪俑還有日、月俑，如前述王□湜墓出土的手捧日、月、星的人俑，有時省去人形僅存日、月造型，見於成都蒲江的魏忻與魏大升家族墓（1098年）與宋燧墓（1103年）。[96] 四川之外，日、月主題也出現在江西，前述南豐縣政和八年（1118年）墓出土陶俑中有一件捧日文官俑，日上刻有文字或道符（圖20）。[97] 江西進賢池吳愿夫婦墓（1119年）也出土瓷塑的日、月各一，座為獨腳獸形，墓中還出土武士俑、十二生肖俑、雙人首蛇身俑、魚俑、伏聽等，類型與四川所見相近。[98] 有認為這類陶俑是《秘

[92] 陳定榮，〈江西南豐縣桑田宋墓〉，《考古》，1988年4期，頁318-328。

[93] 白彬、談北平，〈宋元墓葬的「金雞」「玉犬」〉，《南方民族考古》，第20輯（2020），頁275-317。

[94] 張勛燎、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與道教〉，頁1611-1750；白彬，〈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年6期，頁66-75；白彬，〈四川五代兩宋墓葬中的豬首人身俑〉，《四川文物》，2007年3期，頁56-60。

[95] 鄧天富，〈北川縣香泉宋墓〉，《四川文物》，1991年5期，頁70-72。

[96] 龍騰，〈蒲江北宋魏忻、魏大升墓清理簡報〉，《四川文物》，1997年6期，頁72-74；龍騰，〈蒲江北宋宋燧墓出土文物〉，《四川文物》，1996年5期，頁59-61。

[97] 唐山，〈江西南豐宋墓出土瓷器與南豐窯〉，頁102-105；江西省博物館，〈南豐縣北宋政和八年墓〉，頁146。

[98] 彭適凡、唐昌樸，〈江西發現幾座北宋紀年墓〉，《文物》，1980年5期，頁28-33；江西省博物館，〈進賢縣北宋政和八年墓〉，收入《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10-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葬經》中的「太陽」、「太陰」兩星神，也有的連結到道教靈寶派的修煉儀式，皆有待驗證。[99]

明器模型方面，五代與北宋偶爾還可見到《唐六典》規定的園宅與下帳，如成都金牛區後蜀高官孫漢韶墓（956年），被盜後仍出土灰陶照壁、閣、過廳、亭、假山等構件，整體組合成一座庭園，有類西安中堡村唐墓所出，即《唐六典》的「園宅」。[100] 另一位後蜀高官趙廷隱墓（951年）的殘碎陶片亦復原出加彩灰陶園宅一座（圖21）。[101] 入宋後，明器園宅還可見到，如成都新津王府君夫婦墓出土的四合院落與廣漢雒城女性墓出土的二層樓房。[102] 廣漢雒城墓還罕見地出土許多綠釉明器家具，包括桌椅、鏡台、轎子、床榻與踏凳、屏風、火盆，是四川宋墓中明器模型種類最齊全的（圖22）。由於買地券文字漫漶，只知年代是元祐年間（1086–1094）。這類桌椅、床榻另見於成都保和鄉兩座北宋墓，南宋紀年墓迄今不見，可能已經式微。[103] 它們即宋人的「下帳」，也就是縮小的「床帳、茵席、倚桌」等家具模型。[104]

北朝至盛唐華北地區墓口多見成對的鎮墓獸、武士或天王俑，其中鎮墓獸至晚唐已少見，[105] 四川宋墓完全不見，僅餘一對較為高大的武士俑護衛墓

[99] 陳定榮認為是《秘葬經》的太陽與太陰，見陳定榮，〈論江西宋墓出土的陶瓷俑〉，《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S1期，頁89-95、88；張勛燎、白彬認為是道教影響，見張勛燎、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與道教〉，頁1716-1720。

[100]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五代後蜀孫漢韶墓〉，《文物》，1991年5期，頁11-16；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簡報〉，頁34-38。

[101] 孫杰、王寧，〈成都十陵鎮後蜀趙廷隱墓出土陶質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文物天地》，2022年6期，頁33。

[10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漢縣文物管理所，〈四川廣漢縣雒城鎮宋墓清理簡報〉，《考古》，1990年2期，頁123-130。

[10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保和鄉東桂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359-383。

[104] 司馬光，《溫公書儀》，卷7，頁7b。

[105] 參張勛燎、白彬整理的神怪俑出土一覽表，〈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與道教〉，頁1615-1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室（圖23）。坐獅形鎮墓獸是否以其他形式保留於四川宋墓？抑或為其他器物所取代？四川宋墓有一類不見於過去的奇特陶器，考古報告多稱為「獨腳獸」，作單腳獸足造型或獸足上帶一圓盤，足面或圓盤上有浮雕獸面，整體看來，獸足似為獸面的軀幹，如成都保和鄉張氏墓出土者，圓盤兩面皆浮雕獸面，雙目圓睜，張口吐舌，震嚇意涵強烈（圖24）。[106]

這些獨腳獸的出土位置值得注意，前述保和鄉張氏墓獨腳獸出土於墓口一側，另一側是鼓面刻弧線的「陶鼓」（圖25），獨腳獸與陶鼓分列墓口兩側，後方是武士俑。類似的例子不少，成都宋京與蒲氏夫婦墓中，宋京墓室（1126年）下層出土陶獨腳獸與鼓各一，分別在墓口兩側的武士俑後方，侍俑與文俑之前；妻子蒲氏墓室（1151年）的陶獨腳獸與鼓也緊跟於墓口真文券後方。[107] 成都西南張氏三娘墓室（1218年）墓口左右的武士俑內側為釉陶獨腳獸、鼓各一，中間為釉陶雞與犬，位置更為明確。[108] 成都武侯區楊氏墓沒有出陶鼓，而是出兩件獨腳獸，亦分置墓口兩側的武士俑後方，[109] 成都青龍鄉劉起墓（1094年）的獨腳獸與陶鼓雖然未列墓口兩側，但也在墓口。[110] 同出獨腳獸與陶鼓的墓葬中，只有成都金牛區劉公墓（1235年）不符合前述規律，陶鼓出於墓口武士俑中間，獨腳獸置於一側墓壁中央。[111]

「獨腳獸」與「陶鼓」為宋代四川新出現的明器，兩者多成組出現，與武士俑共同坐鎮入口。尺寸一般在15-20公分之間，比高大的武士俑小很多。獨腳獸與陶鼓的原型為何？北川縣一座可能為北宋時期的墓葬提供線索。該

---

[10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保和鄉東桂村宋墓發掘簡報〉，頁374。

[10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文物》，2006年12期，頁54、53。

[10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信息產業部三十研究所南宋火葬墓的發掘〉，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436。

[10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武侯區川音大廈工地唐宋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601。

[1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273。

[111] 馮先成、程遠福、張丙奎，〈成都市外化成小區南宋墓發掘簡報〉，頁242-25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外化成小區唐宋墓葬的清理〉，頁47-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墓曾出土一件醬釉陶獸，面部如獅，軀幹為一獸足，考古報告稱之為鎮墓獸（圖26）。⑫ 其整體與獨腳獸相似，然而獸首還保留著立體型態，可能是獨腳獸的原型。由此推測，獨腳獸應為獅形的簡化。成都前蜀魏王王宗侃墓（923年）曾出土一陶獅，高9.6公分，頭部殘，僅存鎮墓獸般的坐獅軀幹，由於墓葬被盜，難以確知出土位置，是否為唐代祖明鎮墓獸的微形縮小版（圖27）？⑬ 綜合出土脈絡與造型特徵，宋代獅面獨腳獸與陶鼓或為唐代鎮墓獸的某種替代或縮小簡化形式。上世紀鄭德坤綜述四川宋墓時，曾排比文物造型，提出宋代獨腳獸與陶鼓是從唐代鎮墓獸簡化而來的洞見，今日考古材料更豐富、出土脈絡更清晰，更加強了此說的可能性。⑭

盛唐繁盛一時的明器陶俑衰微後，在四川得到新生，五代時出現類型固定的陶俑，其種類、造型、陳設位置可見唐代兩京、北方、兩湖等各地因素。由於隋唐神怪俑的發展還有許多未解謎團，四川陶俑的來源有些還不易確認，不過在唐代各地方傳統中，關中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伴隨陶俑出土的，常見一種特殊的道教五方鎮墓真文券，顯示關中與成都的密切關聯。

四、關中與成都互動的跡證：道教五方鎮墓真文券

五方鎮墓真文券是兩宋四川特有的隨葬品，完全不見於同時期其他地區。這種特殊的真文券最早出現在唐代的關中地區，迄今有二十多座墓出土，集中於中宗、睿宗、玄宗時期的盛唐墓葬，使用者身份很高，包括中宗定陵、中宗韋皇后陵、睿宗女金仙公主墓（736年）、玄宗孫女清源縣主墓（758年）、懿宗女普康公主墓（866年）等，京兆的韋后家族墓也多有發

⑫ 鄧天富，〈北川縣香泉宋墓〉，頁70-72。

⑬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龍泉驛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成都市龍泉驛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婦墓〉，《考古》，2011年6期，頁38。

⑭ Cheng Te-k'u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wan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77. 謝明良教授提供此條資料，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⑮ 早期埋葬於墓室外的塋域，考古多零星發現，唐肅宗以後多埋於墓室內，有出土完整五方者。按時代，最早例子出自武三思墓（707年）、最晚來自曹用之墓（872年）。由於唐代的五方鎮墓真文石集中出土於西安，宋代四川所見一般認為是玄宗（712–756年在位）、僖宗（873–888年在位）奔蜀時所傳入。⑯

四川兩宋真文券的使用集中於成都，出真文券的32筆資料中只有1筆位於成都南方的樂山井研。⑰ 其中紀年墓有19筆，北宋8筆，南宋11筆。明確出土完整一套五件的最早例證是田世中與馮氏夫婦墓（1062年），與買地券、敕告文券、華蓋宮文券同出，沒有陶俑，不知是否為盜擾所致。⑱ 此前楊氏墓（1035年）與負府君墓（1052年）也出敕告文券或真文券殘塊，但皆僅存碎塊。⑲ 南宋隨葬五方真文券的墓集中於前期，十三世紀只有嘉定六年（1213年）陳氏四娘夫婦墓一座，與買地券、陶俑共出。⑳ 這也許是因為蒙古於

---

⑮ 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下：李子春，〈唐武三思之鎮墓石〉，《人文襍誌》，1958年2期，頁109、87；姜捷，〈關於定陵陵制的幾個新因素〉，《考古與文物》，2003年1期，頁69-74、82；加地有定，《中国唐代鎮墓石の研究：死者の再生と崑崙山への昇仙》（大阪：かんぽう，2005）；劉衛鵬，〈兩方唐代鎮墓石考記〉，《考古與文物》，2011年2期，頁95-99；劉屹，〈唐代的靈寶五方鎮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唐李義珪五方鎮墓石」為線索〉，《唐研究》，第17卷（2011），頁7-38；氣賀澤保規，〈新發現的彭尊師墓誌及其鎮墓石——兼論日本明治大學所藏墓誌石刻〉，《唐史論叢》，2012年1期，頁69-80；張全民，〈《唐故普康公主墓誌銘》與道教五方真文鎮墓石〉，《唐史論叢》，2013年1期，頁234-244。

⑯ 張勛燎，〈川西宋墓和陝西、河南唐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1992），頁145-147。

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井研縣文物管理所，〈四川井研縣金井坪宋代墓地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2年1期，頁19-36。

⑱ 朱章義、劉雨茂、毛求學，〈成都市龍泉驛區青龍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278-294。

⑲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成華區三聖鄉花果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1》（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200-235；墓主姓名「負府君」依魯西奇錄文，見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頁438-439，川陝5。

⑳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石嶺村宋墓發掘簡報〉，頁397-4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34年滅金後集中火力侵略四川，導致人口銳減。入元後，五方真文券已不復見。[121]

一套完整的真文券包含東、西、南、北、中五方刻石，依方位安置於墓室中央與四壁。券石上以篆體陰刻難以識讀的真文，又稱秘篆文，由於真文難以釋讀，券石上經常附加楷體正書。真文券的名稱來自券文本身題名，常見的有五方五帝八天薦拔真文、八天煉度薦拔鎮墓真文等，如成都劉起墓（1094年）出土者題為「南方赤帝八天薦拔劉起真文」、「西方白帝八天薦拔劉起真文」（圖28），妻子張氏墓（1099年）出土者題為「東方八天煉度薦拔鎮墓真文」（圖29）。[122] 題名中的「真文」指的是刻石上的秘篆文，「煉度」與「薦拔」是道士超度亡魂上升仙界的科儀，「鎮墓」指出真文券鎮安墓室的功能。從題名可知，在墓葬的中央四方設置真文券，目的是保衛亡靈在修煉成仙的過程中免受侵擾。

五方鎮墓真文券是道教靈寶派的產物，中央真文十六字，其他四方皆六十四字，這些難以釋讀的文字可能是道教齋儀中上達諸天的內音隱語。[123] 在道教經典中可找到五方真文的記錄，包括：東晉末南朝初的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妙經》、《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皆有記錄，唐末杜光庭（850–933）編集刪定《太上黃籙齋儀》亦有收錄。[124] 盛唐三洞道士朱法滿（?–720）《要修科儀戒律鈔》也說道士死後安葬，若是大德名人，可依《五鍊生尸經》書五石入塚。[125] 藉由五方真文券的辟護，得到神靈保佑、

---

[121] 只有敕告文券還見於重慶合川的兩座墓葬，分別是吳祖壽墓（1332年）與何四娘墓（1339年），見張勛燎、白彬，〈川渝黔地區考古發現的河圖洛書與先天八卦圖研究〉，收入氏著，《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冊4，頁1063-1188。

[12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266-307。

[123] 王育成，〈唐宋道教秘篆文釋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1年，頁82-94、46。

[124] 關於出土真文券源自哪些道書，見以下討論：張勛燎，〈川西宋墓和陝西、河南唐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頁119-148；Carole Morgan, "Inscribed Stones: A Note on a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rial Rit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82, no. 4/5 (1996), pp. 317–348；相關研究整理可見劉屹，〈唐代的靈寶五方鎮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唐李義珪五方鎮墓石」為線索〉，頁7-38。

[125]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正統道藏》，冊6（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頁1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魔不犯，讓道教徒死後可以託屍幽戶（太陰），在墓中煉飭形骸，使骨肉芳香、億劫不滅，以達屍形與魂神合一而升天。[126]

五方鎮墓真文券有時與敕告文券、華蓋宮文券同出。前者是天帝指示土下塚中諸神的牒告，令其不得危害死者之氣，並常保生者安吉；後者是告華蓋宮五方旺氣神趙公明之文，令其於塚墓之中轉禍為福，使真魂安靜，受度南宮。根據研究，這兩種券文文字來自上清派道士陶弘景（456–536）的《真誥》，目的也在幫助道教徒死後於墓中煉飭屍形，以求達到神、形合一，升天成仙，令子孫永無塚墓之患。[127]

在墓中置五方真文券除了煉度、薦拔、鎮安亡魂，劉起墓的中央真文券還刻著：「切〔竊〕恐三世宿緣，悞有僊尤，死宅斯原，慮多忏犯，希迴巨福，保護真魂，已生未生，悉皆寧謐」。[128] 可知另一個考慮是擔憂對陰宅上下神靈有所忏犯，因此以真文券保護亡者真魂，祈求子孫吉福。同墓出土的買地券局部雖缺損，也存類似文字：「故氣邪精，不得忏悋。先有居者，永避萬里」，[129] 同樣擔憂對墓地上下故氣邪精有所忏犯。買地券是死者向地下官府購買葬地的憑證，根據《地理新書》，凡葬必先斬草，以「斷惡鬼，安亡魂也」，斬草時於地心與棺柩前各埋一方買地券。[130] 由此看來，作為道教科儀產物的真文券，功能與傳統的買地券有所重疊，兩者在墓中具有什麼關係？

---

[126] 關於道教的死後修煉以及遼墓相關考古遺存，見Anna Seidel, “Post-mortem Immortality or: The Taoist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S. Shaked et al., eds., *Gilgul: Essays on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Leiden: E.J. Brill, 1987), pp. 223–237; Hsueh-man Shen, “Body Matters: Manikin Burials in the Liao Tombs of Xuanhua, Hebei Province,” *Artibus Asiae*, vol. 65, no. 1 (2005) pp. 99–141; 張超然，〈早期道教喪葬儀式的形成〉，《輔仁宗教研究》，第20期（2010），頁27-66。

[127] 張勛燎，〈川西宋墓和陝西、河南唐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頁119-148。

[12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300。

[12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305。

[130] 王洙等撰，張謙校正，《圖解校正地理新書》（金明昌三年張謙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14，頁11b-12a。見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94300.cn/page/n66/mode/2up（檢索日期：2020年3月16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真文券與買地券的出土情況，出土真文券的32筆資料中有19筆共出買地券（表三），比例不低，可見這兩類券石在墓中應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取代。此作法可能提供死者雙保險：在斬草儀式斬斷土地上下惡鬼、埋下買地券後，若仍有忤犯者，再以真文券鎮壓。也可視為信仰上的層累，在東漢已出現的買地券上疊加道教真文券以強化鎮壓不祥的功能。[131]

表三　真文券與其他器物共出情況

	真文券	買地券	陶俑	墓誌
真文券	32	19	20	7
買地券	19	145	67	8
陶俑	13	67	154	18
墓誌	5	8	18	30

□ 某類出土筆數
□ 兩類共出，例如：陶俑欄真文券列「20」為兩者共出的資料資料筆數
■ 欄的條件向上累加，例如：真文券欄陶俑列「13」為出真文券、買地券、陶俑的資料筆數

除了真文券與買地券，墓中護衛墓主的還有神怪陶俑，真文券、買地券、陶俑三者共出情況如何？根據表三統計，出土真文券的墓葬筆數32，共出買地券的有19筆，真文券、買地券與陶俑三者共出的為13筆。換句話說，出土真文券與買地券的墓葬也常出土陶俑，三者共同構成護衛墓主的陣列。

三者當中，陶俑與買地券較普及，真文券非常罕見。如表三所示，874筆四川宋墓中，出土陶俑的達154筆、買地券的有145筆、真文券只有32筆，而且幾乎都在成都，可知真文券的使用不但區域性明顯，也僅限於少數人。這些埋葬真文券的喪家可能是相信亡魂煉度與薦拔的道教徒，也可能是特別重視鎮壓不祥、安寧亡魂，以求子孫昌盛的俗眾。總之，這些使用者應有共通信仰，除此之外，他們是否還有其他共通之處？

[131] 中國傳統墓葬中經常是不同傳統的層累，而非單一信仰的表現，以提供死者多重保障，巫鴻稱之為polycentric，見Wu Hung, *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s: 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pp. 17–84, 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墓誌中的移民線索

四川唐代墓葬既少見明器陶俑，也不見真文券，宋代的這些作法無疑是外地移入。成套陶俑於五代便出現，來源較多元；真文券始出現於北宋，源自關中應無疑問，一般認為是玄宗、僖宗奔蜀所帶入。然而兩位皇帝奔蜀時間相隔百年以上——前者因安史之亂（755–763）、後者因黃巢之亂（875–884）——此期間長安的喪葬文化發生很大改變，兩次人群移動引入的習俗應有所不同。上層階級墓中隨葬的墓誌經常追溯家族源流，提供移民線索。本節從墓誌出發，分析墓主祖源與墓中隨葬陶俑、真文券的關聯，有助於具體掌握四川喪葬習俗的來源。

四川兩宋874筆墓葬資料中，30筆出墓誌，其中帶陶俑的有18座墓，帶真文券的有7座（表三）。由於真文券的特殊性高，又集中於成都，使用人群較特定，應該較容易釐清。共出墓誌與真文券的7座墓皆陪葬陶俑（附表八），有單彩、三彩、也有白衣彩繪，使用上似乎沒有區別。其中只有王氏墓（1132年）的墓誌缺損，無法判斷家族來源，其餘6座皆有京兆長安淵源，墓誌摘錄見附表八。[132] 張確（1023–1081）是四川大族，妻杜氏（1023–1090）「其先京兆人，始居蜀者，未得其詳」；[133] 劉觀（1027–1079）、劉起（1051–1089）父子的墓誌更說先祖隨僖宗入蜀：「其先長安人也，六代祖再思仕唐為御史，僖宗狩蜀，扈駕而西，嗣子孟溫遂家於成都」；[134] 宋京（1079–1124）墓誌也說先祖為隋諫官，從長安貶官至彭山，而後落籍成都，此說與父親宋構（1040–1097）墓誌所記「從僖宗狩蜀，遂家眉州」（附表八）有出入，不過他們皆認為祖上來自長安沒有疑問。[135]

---

[132] 王氏墓見傅漢良，〈成都外東跳蹬河發現宋代墓葬〉，《考古通訊》，1956年6期，頁72-76。

[133]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翁善良、羅偉先，〈成都東郊北宋張確夫婦墓〉，《文物》，1990年3期，頁1-13。

[13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266-307。

[13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頁52-67；劉雨茂、榮遠大，〈北宋宋構夫婦墓葬的發現與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3期，頁77-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使用墓誌與真文券的家族皆有長安淵源，經常將入蜀追溯至僖宗，而非玄宗。從夫婦合葬墓的墓誌內容可知，入蜀的京兆後人多與本地望族通婚，如前述張確夫婦、劉起夫婦，皆為移民與在地家族通婚之例。即便落籍成都多代，直到南宋初年仍保有京兆祖籍的意識，如宋京。他們相信家族隨僖宗從前朝首都長安移居僻處一隅的蜀地，這或許讓他們保有某種意識形態與文化上的優越感；聚居在成都的長安人後代，也許還形成某種類似同鄉會的集體意識。我們無法驗證墓誌所記的京兆祖源是否為真，但墓中所出的五方鎮墓真文券顯示這個說法其來有自。只是唐代京兆真文券使用者的身份階級非常高，宋代成都使用者身份最高的是宋京，官五品朝散大夫，多數墓葬沒有墓誌，應是無官的地方菁英。

接下來討論隨葬陶俑的墓主家族來歷。陶俑於五代便已出現，較北宋前期才出現的真文券早上許多。隨葬陶俑的三座五代墓中，以安樂郡王孫漢韶（884–955）的身份最高，父親是後唐太祖李克用（856–908）養子，孫漢韶從後唐入蜀投降高祖孟知祥（874–934），墓誌載「其先太原人」。[136] 其他前、後蜀高官墓雖出土不少，但多被盜，僅餘棺台與零星隨葬品。[137] 至於其他兩座出土成批陶俑的徐公夫婦（939、964年）與宋琳墓（956年），皆只出買地券，沒有墓誌記載家族源流。[138]

宋代隨葬陶俑的墓有18筆出墓誌，其中12筆有記家族來源，可分兩群：一群先祖來自長安，多使用真文券，常與在地大家通婚，如前述劉起與宋京家族；另一群為四川本地大族，如胡中庸（1130–1200）家族「世為崇慶晉原人」

[136]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五代後蜀孫漢韶墓〉，頁11-16。

[137] 前、後蜀高官墓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龍泉驛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成都市龍泉驛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婦墓〉，頁33-4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前蜀晉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3年10期，頁915-918、907；成都市文物管理處，〈成都市東郊後蜀張虔釗墓〉，《文物》，1982年3期，頁21-27。

[13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雙流縣文物管理所，〈成都雙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後蜀雙室合葬墓〉，頁323-363；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四川彭山後蜀宋琳墓清理簡報〉，頁18-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崇州）、張應卯（1156–1209）兄弟為「綿州巴西人」（今綿陽）。[139] 其中張岩墓誌（1202年）較特殊，追溯先祖至唐玄宗賜名的張延賞（726–787），蒲州猗氏縣（今山西臨猗）人，然「遷徙不知自何許代」；妻子鄒氏的墓誌沒有追溯祖源，應是本地家族。[140] 從墓誌可知，陶俑的使用者不分本地外來，身份有品官、有士人、更多的是地方菁英，是五代以來地方家族普遍採用的葬俗。

一般認為玄宗、僖宗入蜀促進四川發展，確實有不少宋代墓誌提及祖上隨僖宗入蜀，提到玄宗的只有張岩墓誌。雖無法確知墓誌記載有多可靠，若考量陶俑與真文券的出現時間，使用陶俑的人群應比使用真文券的人群更早來到四川。再結合唐代兩京喪葬文化的發展，安史之亂時隨葬陶俑的風氣猶盛，玄宗入蜀可能將此習俗帶到四川；百年之後僖宗奔蜀時，盛葬陶俑之風已然消退，厭勝的鐵豬與鐵牛興起，道教真文券隨著上層貴族進入成都，疊加在原本的葬俗之上。

隨僖宗入蜀的人士中有道教著名學者杜光庭（850–933），後來便留在成都，受前蜀王建（847–918）所用，賜號廣成先生。杜光庭所著《太上黃籙齋儀》有收錄五方鎮墓真文券內容，北宋至南宋前期真文券在成都的流行，應與此有關。[141] 有意思的是，成都的王建陵墓（918年）出現了重達60公斤的鐵牛與鐵豬（圖30），但並未發現真文券，推測此時隨葬真文券的風氣尚未興起。[142] 王建也是外來移民，籍貫許州舞陽（今河南舞陽），救護唐僖宗有功。[143] 鐵牛與鐵豬興起於晚唐兩京地區，用以鎮壓地下的土龍與水龍，王建墓所見顯然來自京兆。不過鐵牛、鐵豬沒有在四川生根，不見於其他五代或宋代墓葬。

---

[13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崇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崇州市同心村宋墓群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334-353；李復華、江學禮，〈四川綿陽平政橋發現宋墓〉，《考古通訊》，1956年5期，頁49-50。

[140] 王玉，〈四川安岳縣老鴉山南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9年1期，頁14-27。

[141] 張勛燎，〈川西宋墓和陝西、河南唐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頁145-147。

[142]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65。

[143] 歐陽修撰，《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63，頁783-7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紀年墓資料顯示，陶俑與真文券的流行皆較玄宗與僖宗奔蜀滯後了一段時間。真文券出現在西元1035或1052年，約杜光庭死後百年；陶俑出現於939年，比玄宗奔蜀晚了180年，應如何解釋時間落差？首先須考慮的是，在總數超過八百筆的四川宋墓中，紀年墓只有124筆，佔比極小。出土陶俑的154筆中僅62筆有紀年；真文券的情況較好，32筆中24筆有紀年。紀年墓的時間分佈也不平均，集中於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十世紀僅2筆。要替大量無紀年的墓葬一一釐定時間，不啻是一大挑戰。更麻煩的是，四川考古中有一段唐代空白期，考古學家往往不能區分唐、五代墓葬，有時甚至將之歸入宋代。[144]也許有些晚唐、五代的墓葬沒有被辨識出來，此問題牽涉材料過於龐大，只能留待日後探討。

餘論

來自儒家經典的古典明器，是富有中國特色的一類隨葬品，唐、宋之際出現轉折。漢唐時流行的陶俑衰微，僅在南方一些地區仍可見到，其中以四川最盛。本研究以四川宋墓為中心，探討這個唐、宋巨變，並追蹤中晚唐長安喪葬習俗移植四川的情況。首先從禮制規範來看，宋代大致承襲唐代，雖然禮數縮減、官等差距縮小，然而直到南宋都還明文規範明器數量，可知仍為葬禮所需。華北宋墓不見明器，應是紙明器流行之故，在此情況下，持續使用陶俑的四川便顯示出對於傳統的堅持與固守。其次分析四川宋墓的陶俑類型與可能來源，其中以關中因素最突出。來自京兆長安的，還有成都的鎮墓真文券，直接證明從長安向四川的人群移動。最後結合墓誌，思考墓葬所見與文獻所載玄宗、僖宗入蜀的可能關聯，嘗試釐清這兩次政治事件所帶動的移民如何塑造、重塑四川的喪葬傳統。

從墓葬看來，中晚唐兩波移民造成的結果並不相同。第一波移民自關中引進陶俑後，在四川各地生根，成為大家族普遍採用的葬俗，不分本地外來。生根之後，更因應信仰出現各種混合人與動物造型的神怪俑，成為深具

[144] 劉雨茂、朱章義，〈四川地區唐代磚室墓分期研究初論〉，頁5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方特點的明器。第二波移民帶來了鎮墓真文券，但只出現在成都，墓誌顯示使用者多具有長安淵源，顯示出強烈的集體性。這些聚居在成都、使用真文券的長安人後代，至南宋初還保留著京兆祖源記憶。由此推測，真文券或許還代表他們與京兆的紐帶，讓新移民在死後世界中展現共通的信仰與來源，或者還藉此與本地化程度較深的舊移民相區隔。

北宋末年，宋金戰爭迫使新一波中原移民進入四川，南宋時期的移民不再標榜來自長安，而是來自華北各地。葬於廣元的王光祖（葬於1186年）來自「秦州成紀」（今甘肅天水），[145] 葬於重慶的杜之翰（葬於1156年）為「山東沂州費縣東蒙里人」，[146] 另一位葬在重慶的王若（卒於1192年以後），官朝散大夫知合州，墓誌說：「其先河南人」。[147] 四川的南宋墓葬也出現一些新作法，如前述王光祖墓的墓口雕刻武士，墓內雕刻夫婦對坐、孝子圖；重慶永川區毛天鳳墓（建於1205–1207年）墓壁雕刻屏風、格子門，北壁左側倚柱刻有「南陽毛天鳳郎壽堂」，可知是河南移民後裔。[148] 無論是夫婦對坐、孝子圖、或是格子門，都是北宋華北磚室墓流行的裝飾題材，顯為兩宋之交新一波的移民所引入。

兩宋之際入蜀的華北新移民可能也改變既有的移民文化，十二世紀下半以後，成都的真文券使用者多不再追溯其長安祖源。這或許是因時代邈遠，又或者在新一波移民的映照下，隨僖宗入蜀的移民後裔已成為在地。四川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唐宋之時屢屢成為華北移民避難南遷的聚居地，相較於四川唐墓的幾近空白，宋代墓葬爆增，佔各省之冠。仔細分析宋代四川紀年墓與隨葬品，可看到不同時期的首都特點疊加或並陳的情況。

---

[14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元市文物局、廣元市博物館，〈四川廣元市水櫃村南宋王光祖墓〉，《考古》，2020年2期，頁70-82。

[146]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重慶市合川區觀山墓群宋代石室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4年2期，頁29-36。

[147] 大足石刻研究院，〈重慶市大足區龍神灣南宋王若夫婦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5年4期，頁27-39。

[148]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市永川區文物管理所，〈重慶永川高洞子南宋墓群清理簡報〉，《文物》，2020年6期，頁25-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幾波移民引入的中原習俗中，陶俑不但在各地生根，還出現新的神怪俑，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明器陶俑的風行可能是因為它出自儒家經典，於古有據，見於歷代朝廷禮典規範。蜀地雖僻處一隅，但蜀人對自己的習俗相當自豪，認為與古禮最相合，頗有「禮失求諸野」的味道。最有名的是籍貫四川眉山的蘇軾（1037–1101）曾說，蜀地的夫婦合葬墓是同墳異壙，兩室之間以通道相連，而非同葬一室，這種作法最符合《詩經》的精神，「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也」。[149] 陶俑也不妨在這個脈絡中理解，當北宋首都汴京都改用紙明器了，蜀地仍堅持禮典所規範的陶明器，可說是宋境最具古風的地方了。

蒙元時期，隨著忽必烈攻打中原，新一批軍事菁英崛起，當他們開始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並營造文化形象時，西安元墓再次出現成套陶明器（圖31）。[150] 這些明器固然與唐代有相似之處，應參考了唐墓出土品，但這復唐代之古的作法，很可能受到四川啟發。以陝西西安發現的劉黑馬（1200–1262）家族墓地為例，劉黑馬自稱契丹耶律德光之後，是蒙古攻打四川的大將，早在西元1240年便進入成都，官至成都路經略使，長子劉元振（1225–1275）襲父職，繼續經略蜀地，父子墓中皆出現成批黑衣陶俑。[151] 唐代以後

---

[149] 蘇軾，《東坡題跋》，收入毛晉，《津逮秘書》（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卷1，頁21-2、22-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8月15日）；此類夫婦合葬墓相關討論見Helga Stahl, “Su Shi’s Orthodox Burials: Interconnected Double Chamber Tombs in Sichuan,” in Dieter Kuhn, ed., *Burial in Song China*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4), pp. 161–214.

[150] 之前學者所論的元墓復古類型器物可以在此脈絡理解，見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頁143-168；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3），頁1-26；許雅惠著，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訳，〈図籍の間接的流通再論——元代『三礼図』を例として——〉，收入近藤一成等編，《中国伝統社會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十集（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267-301。袁泉，〈洛渭地區蒙元墓隨葬明器之政治與文化考〉，頁61-78。

[151] 劉黑馬墓誌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24-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北墓葬便罕見陶俑，隨著蒙古軍併吞四川，以明器陶俑隨葬的古風又傳回西安。

關於四川宋墓還有一些難解的問題。兩宋墓葬超過八百筆，紀年墓超過百座，南宋紀年墓更是宋境數量最多的。相較之下，唐、元兩代可說相當空白。唐墓已如前述，晚唐經常無法與五代相區分，有時被歸入北宋，以致出現晚唐空白。元代也有同樣的情況，四川與重慶的元墓目前僅有十餘座，遠低於兩宋，這是因為蒙元對四川的摧殘，還是由於南宋與元代無法區分，以致多被歸入南宋。上述空白可能意味斷裂、也可能代表過渡，要正確評估隨葬文化的長時段發展，還需要對沒有紀年的龐大墓葬進行系統性分析，這項工作只能留待未來。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 《開元禮》（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明器規定①

官品	明器	帳	女子、音聲僕從	園宅	奴婢等
三品以上	九十事	高六尺，方五尺	三十人，長八寸	方五尺	二十人，長四寸
五品以上	六十事	高五尺五寸，方四尺五寸	二十五人，長七寸五分	方四尺	十六人，長三寸
九品以上	四十事	高五尺，方四尺	二十人，長七寸	方三尺	十二人，長二寸

附表二 《唐六典》（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喪葬規定②

官品	懸鬲	銘旌	輀車	引披鐸翣挽歌	方相魌頭	明器
一品	六	長九尺	油幰，朱絲絡網，施襜，兩廂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	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有挽歌者，鐸依歌人數	方相四目	九十事
二品	四					
三品						
四品		長八尺	油幰，施襜，兩廂畫雲氣，四旒蘇	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四行十有六人		六十事
五品						
六品	二	長七尺		二鐸、二翣	魌頭兩目	四十事
七品						
八品			油幰，施襜，兩廂畫雲氣，無旒蘇		--	
九品						
庶人	--	--	鼈甲車，無幰、襜、畫飾	--	--	--

① 蕭嵩纂，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72），「序例下・雜制」，卷3，頁34。

②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8，頁5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三 《唐會要》載唐憲宗元和六年（811）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規定③

官品	明器	園宅下帳	輛車	披引鐸翣	車	挽歌	
三品以上	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	園宅方五尺，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舁。④	油幰，朱絲網絡，兩廂畫龍，幰竿末請用流蘇四	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一〔二〕、畫翣二	輴車、誌石車、方相車、魂車	三十六人	以前明器，竝用瓦木為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等不得過七寸，竝不得用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
五品以上	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	園宅方四尺，下帳高方二尺，共置三十舁。	同上，無朱絲網絡，流蘇減二十道	同上，披引鐸翣各減二	輴車、方相用魌頭車、魂車	一十六人	
九品以上	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	園宅方三尺，下帳高方一尺，共置一十舁。	同上，流蘇減一十五道	同上，披引鐸翣各減二	魌頭車、魂車	十人	
庶人	一十五事，共置三舁（不置四神十二時）	不置	同上，流蘇減十道	不置	魌頭車、魂車	不置	所造明器，竝令用瓦，不得過七寸

③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38，頁69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④ 此處的「共置五十舁」，估計應該包含明器，一共得以五十小床裝載抬舉，以下五品、九品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四 《宋史》載後唐長興二年（931）詔⑤

官品	明器	喪輿舁者	挽歌	
四品以上	依令式施行			悉用香輿、魂車。其品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
五品六品常參官	三十事，共置八床	二十人	八人	
七品常參官	二十事，置六床	十六人	六人	
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	十五事，置五床	十二人	四人	
庶人	十二事，置兩床	八人	不置	

附表五 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天聖令・喪葬令》⑥

官品	重挂鬲	銘旌	輀車	引披鐸翣挽歌	方相魌頭
一品	六	長九尺	油幰，朱絲絡網，施襜，兩廂畫龍，幰等〔竿〕諸末垂六旒蘇	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	用方相
二品	四				
三品					
四品		長八尺	油幰，施襜，兩廂畫雲〔龍〕氣，垂四旒蘇	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四行十六人	
五品				**挽歌八人	用魌頭****
六品	二	長七尺			
七品				挽歌六人	
八品			油幰，施襜，兩廂畫雲氣，無旒蘇		--
九品				***挽歌四人	
十品	--	--	--		
庶人			鼈甲車，無幰、襜、畫飾	--	

* 下有雙行小字注「有挽歌者，鐸依歌人數，以下准此」
** 「五品六品」下有雙行小字注「謂外〔升〕朝者皆准此」
*** 「九品十品」下有雙行小字注「謂非外〔升〕朝者」
**** 下有雙行小字注「方相四目，魌頭兩，並深清衣朱裳，執戈揚盾載於車」

⑤ 脫脫等撰，《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125，士庶人喪禮，頁291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⑥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上冊，卷29，頁204-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六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政和五禮新儀・序例》⑦

<table>
<tr><th>官品</th><th>重挂鬲</th><th>銘旌</th><th>紼披鐸翣</th><th>挽歌</th><th>鞏</th><th>車</th><th>明器</th><th>輀車</th><th>方相魌頭</th></tr>
<tr><td>一品</td><td>六</td><td rowspan="5">長九尺</td><td rowspan="4">紼四、披四、鐸六、翣六</td><td rowspan="4">六行行六人</td><td>一百一十二人</td><td rowspan="5">八十二人</td><td rowspan="4">五十</td><td rowspan="4">油幬，朱絲絡網，施襜，兩廂畫龍，幬竿諸末垂旒蘇六</td><td rowspan="4">方相四目</td></tr>
<tr><td>二品</td><td rowspan="4">四</td><td rowspan="3">七十二人</td></tr>
<tr><td>三品</td></tr>
<tr><td>四品</td></tr>
<tr><td>五品</td><td rowspan="3">長八尺</td><td rowspan="3">紼二、披二、鐸四、翣四</td><td rowspan="3">四行行四人</td><td rowspan="4">六十二人</td><td>三十</td><td rowspan="3">油幬，施襜，兩廂畫雲氣，垂旒蘇四</td><td rowspan="3">魌頭兩目</td></tr>
<tr><td>六品</td><td rowspan="3">三十二人</td></tr>
<tr><td>七品</td><td rowspan="3">二</td><td rowspan="3">長七尺</td><td rowspan="3">鐸二、翣二</td><td>*六人</td><td>**二十</td></tr>
<tr><td>八品</td><td rowspan="2">二十六人</td></tr>
<tr><td>九品</td><td>四人</td><td>二十人</td><td>--</td><td>--</td></tr>
<tr><td>庶人</td><td>--</td><td>--</td><td>--</td><td>--</td><td>一十六人</td><td>--</td><td>一十</td></tr>
</table>

*「八品以上」下有雙行小字注「陞朝官准六品」
**「九品以上」下有雙行小字注「陞朝官准六品」

⑦ 宋徽宗敕編，鄭居中編纂，《政和五禮新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647，卷24，頁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七 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慶元條法事類》「喪葬・服制格」⑧

官品	重挂鬲	銘旌	紼披鐸翣	挽歌	擧	車	明器	石獸	輀車	方相魌頭
一品	六	長九尺	紼四、披四、鐸六、翣六	六行行六人	一百一十二人	八十二人	五十	六	油幰，朱絲絡網，施襜，兩廂畫龍，幰竿諸末垂旒蘇六	方相四目
二品	四				七十六人					
三品										
四品										
五品		長八尺	紼二、披二、鐸四、翣四	四行行四人		六十二人	三十	四	油幰，施襜，兩廂畫雲氣，垂旒蘇四	魌頭兩目
六品					三十二人					
七品	二	長七尺	鐸二、翣二	*六人			**二十	--		
八品					二十六人					
九品				四人	二十人				--	--
庶人	--	--	--	--	一十六人	--	一十			

*「捌品以上」下有雙行小字注「陞朝官准陸品」
**「玖品以上」下有雙行小字注「陞朝官准陸品」

⑧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頁560-5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八 出土墓誌的四川宋墓（灰底者出真文券）

編號	出土地	年代	姓名	身份	關係人	家族來源	墓誌記載	陶俑	真文券	買地券
1	四川省德陽市綿竹市城西郊	1064	張紘	太子中舍監	無	長安，隨僖宗入蜀	「其先本籍長安，有為唐勛臣者，從僖宗入蜀，因家焉。」	無	無	無
2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縣鄧雙鄉金竹村M1	1081	王府君	無	無	不明	不明	有	無	無
3	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東郊	1084、1093	張確、杜氏	無	無	邛崍；長安	張確先人「自邛徙蜀之永康」；杜氏「其先京兆人，始居蜀者，未得其詳。」	有	有	有
4	四川省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	1094	劉起	士人	妻張氏、父劉觀	長安，隨僖宗入蜀；成都	劉起：「其先長安人也，六代祖再思仕唐為御史，僖宗狩蜀，扈駕而西，嗣子孟溫遂家於成都。」張氏：「世家成都」	有	有	有
5	四川省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	1082、1095	劉觀	無	子劉起	長安，隨僖宗入蜀	「其先長安人也，六代祖再思隨唐僖宗西狩，嗣子孟溫遂家於成都。」	有	有	有
6	四川省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	1099	張氏	無	夫劉起	長安，隨僖宗入蜀；成都	劉起：「其先長安人也，六代祖再思仕唐為御史，僖宗狩蜀，扈駕而西，嗣子孟溫遂家於成都。」張氏：「世家成都」	有	有	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	四川省成都市龍潭鄉	1101	宋構、李氏	朝奉大夫	子宋京	長安，隨僖宗入蜀；華陽	宋構：「從僖宗狩蜀，遂家眉州」；李氏「本出隴西，後徙華陽」	無	無	無
8	四川省成都市邛崍縣五綿山	1113	徐姓墓主	無	無	不明	不明	有	無	無
9	四川省成都市北郊龍潭鄉保平村M2	1126	宋京	朝散大夫	妻蒲氏	由長安徙成都；閬州	宋京：「隋諫臣宋遠之後。遠，長安人，以XX獲罪，貶居眉之隆山，其徙籍于成都雙流者，今八世矣。」蒲氏：「閬州之新井人」	有	有	有
10	四川省成都市東跳蹬河M1、M2	1132	王氏、不明	宜人	無	不明	不明	有	有	無
11	四川省成都市北郊龍潭鄉保平村M1	1151	蒲氏	太令人	夫宋京	由長安徙成都；閬州	宋京：「隋諫臣宋遠之後。遠，長安人，以XX獲罪，貶居眉之隆山，其徙籍于成都雙流者，今八世矣。」蒲氏：「閬州之新井人」	有	有	有
12	四川省重慶市合川區	1156	杜之翰	無	無	山東沂州	「山東沂州費縣東蒙里人」	無	無	無
13	四川省眉山縣修文鄉	1161	蘇符	朝議郎	蘇軾家族	世家眉山	「世家眉山」	無	無	無
14	四川省瀘縣喻寺鎮	1176	古驥	無	無	懷安（今四川金堂縣）	「豳國古氏，家懷安」	無	無	無
15	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龍台鎮	1179	姚氏	夫為奉議郎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	四川省廣元市水櫃村M1	1186	王光祖、劉氏	後軍統制兼彈壓利州軍馬、恭人	無	秦州成紀（今甘肅天水）	王光祖：「秦州成紀人也」	無	無	無
17	四川省瀘縣奇峰鎮寶藏片區	1187	陳鼎	承奉郎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8	重慶市大足區觀音岩村龍神灣M2	1190	徐守真	安人，贈孺人	夫王若	由河南徙蜀；懷安（今四川金堂縣）	王若：「其先河南人……八世祖尚恭避亂徙蜀居昌」，徐守真：「懷安金堂之古城鎮人」	無	無	無
19	重慶市大足區觀音岩村龍神灣M1	1192	王若	朝散大夫知合州	妻徐守真	由河南徙蜀；懷安（今四川金堂縣）	王若：「其先河南人……八世祖尚恭避亂徙蜀居昌」，徐守真：「懷安金堂之古城鎮人」	無	無	無
20	四川省蒲江縣犀羊村	1199	宋德章、何氏	朝散大夫、宜人	無	由長安徙彭山而邛崍	宋德章：「隋諫官以謫來隆山，即今彭山，後分籍邛之依政。」全文2590字。何氏墓誌無祖源。	有	無	有
21	四川省彭山縣雙江鎮	1200	留氏	安人	夫虞公著	四川仁壽；泉南（今福建泉州）	虞公著，四川仁壽人；留氏「泉南人」	有	無	無
22	四川省安岳縣岳陽萬壽村老鴉山（汪家溝）M1	1202	張岩	無	妻鄒氏	長安或山西；無	張岩墓誌追溯祖上至唐玄宗賜名的張延賞，然「遷徙不知自何許代」；鄒氏祖源不明。	有	無	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3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同心村M1	1208	胡中庸、王氏、袁氏	士人	胡中庸家族墓	崇慶晉原（今四川崇州西北）	胡中庸：「世為崇慶晉原人」	有	無	無
24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同心村M4	1208	不明	士人	胡中庸家族墓	崇慶晉原（今四川崇州西北）	胡中庸：「世為崇慶晉原人」	有	無	無
25	四川省綿陽北郊平政橋M4	1209	張應龍	鄉貢進士	兄張應卯	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	「綿州巴西人」	有	無	有
26	四川省綿陽北郊平政橋M3	1209	張應卯	宣教郎	弟張應龍	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	「綿之巴西人」	有	無	有
27	四川省彭山縣雙江鎮	1227	虞公著	中奉大夫	妻留氏	四川仁壽；泉南（今福建泉州）	虞公著，四川仁壽人；留氏「泉南人」	無	無	無
28	四川省安岳縣岳陽萬壽村老鴉山（汪家溝）M2	南宋	鄒氏	無	夫張岩	長安或山西；無	張岩墓誌追溯祖上至唐玄宗賜名的張延賞，然「遷徙不知自何許代」；鄒氏未述祖源。	有	無	無
29	重慶市奉節縣寶塔坪遺址IM4008	南宋及以後	張仲成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30	四川省北川縣香泉鄉	宋	無	無	無	不明	不明	有	無	無

附表九 四川、福建、江西出土宋代墓葬一覽

請至此連結瀏覽墓葬整理表：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handle/123456789/7370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
王洙等撰；張謙校正
《圖解校正地理新書》，金明昌三年張謙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94300.cn/page/n66/mode/2up（檢索日期：2020年3月16日）。
王溥
《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五代會要》，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
司馬光
《溫公書儀》，百部叢書集成，據清嘉慶學津討原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
《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朱法滿
《要修科儀戒律鈔》，《正統道藏》，冊6，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
《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宋徽宗敕編；鄭居中編纂
《政和五禮新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脫脫等撰
《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臺北：鼎文書局，1980。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1年3月17日、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7日）。
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劉昫撰
《舊唐書》，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盧文弨
《儀禮注疏詳校》，清乾隆盧文弨輯刊本，抱經堂叢書，卷13。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3日）。
蕭嵩纂；池田溫解題
《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72。
聶崇義
《新定三禮圖》，1175印本，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蘇軾
《東坡題跋》，收入毛晉，《津逮秘書》，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8月15日）。

近人論著

大足石刻研究院
2015 〈重慶市大足區龍神灣南宋王若夫婦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4期，頁27-39。
The Academy of Dazu Rock Carvings
2015 “Chongqing Shi Dazu Qu Longshenwan Nansong Wang Ruo fufu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mb of Wang Ruo and His Wife at Longshen Bay, Dazu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Sichuan Cultural Relic*, no. 4, pp. 27–39.
仁井田陞原著；栗勁等編譯
1989 《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
Niida Noboru; Li Jin et al.
1989 *Tang ling shiyi* (Tang Code Supplements), Changchun: Changchun chubanshe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王仁波
1987 〈西安地區北周隋唐墓葬陶俑的組合與分期〉，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頁428-456。
Wang, Renbo
1987 “Xi’an diqu Beizhou Sui Tang muzang taoyong de zuhe yu fenqi (The Assembly and Chronology of Pottery Figurines from Northern Zhou, Sui, and Tang Tombs in the Xi’an Region),” in *Zhongguo kaoguxue yanjiu lunji* bianweihui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ollected Paper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ed., *Zhongguo kaoguxue yanjiu lunji: jinian Xia Nai xiansheng kaogu wushi zhounian* (Collected Paper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r. Xia Nai’s Archaeological Career), Xi’an: Sanqin Press, pp. 428–4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玉
2009 〈四川安岳縣老鴉山南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期,頁14-27。
Wang, Yu
2009 "Sichuan Anyue Xian Laoguashan Nansong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Southern Song Tomb at Laogua Mountain, Anyue County, Sichua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14–27.
王去非
1956 〈四神、巾子、高髻〉,《考古》,5期,頁50-54。
1979 〈隋墓出土的陶「千秋萬歲」及其他〉,《考古》,3期,頁275-276。
Wang, Qufei
1956 "Sishen, jinzi, gaoji (Four Gods, Towel-Holding Attendants, and High Bun Hairstyles)," *Archaeology*, no. 5, pp. 50–54.
1979 "Sui mu chutu de tao 'Qianqiu Wansui' ji qita (Pottery 'Qianqiu Wansui' and Others from Sui Tombs)," *Archaeology*, no. 3, pp. 275–276.
王仲雄、王軍
2001 〈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11-224。
Wang, Zhongxiong, and Jun Wang
2001 "Chengdu Shi Erxianqiao Nan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f a Southern Song Tomb at Erxianqiao, Chengdu City),"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1999*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1999),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11–224.
王育成
1991 〈唐宋道教秘篆文釋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頁82-94、46。
Wang, Yucheng
1991 "Tang Song Daojiao mi zhuanwen shili (Transcriptions of Daoist Secret Seal Script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pp. 82–94, 4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 《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1980 *Excav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Tombs at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1 *The Tang Tombs in Yanshi Xingyuan*, Beijing: Science Press.
王銘
2014 〈唐宋墓葬中的千秋萬歲鳥與觀風鳥的不同形象辨析、歷史來源及象徵意義〉,《江漢考古》,1期,頁94-101。
Wang, Ming
2014 "A Differentiation to the Shape, Origin, and Symbol between the Long Live Bird Figu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the Wind Observing Bird Figure Excavated from the Tomb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ianghan Archaeology*, no. 1, pp. 94–101.

王德毅

1976 〈關於「慶元條法事類」〉，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1-7。

Wang, Teh-yi

1976 "Guanyu 'Qingyuan tiaofashi lei' (On the 'Qingyuan Tiaofa Shilei')," in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bianjib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Shin Wen Feng Print Co.), ed., *Qingyuan tiaofa shilei*,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pp. 1–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漢縣文物管理所

1990 〈四川廣漢縣雒城鎮宋墓清理簡報〉，《考古》，2期，頁123-130。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Guanghan Xian wenwu guanlisuo (Guanghan Coun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1990 "Sichuan Guanghan Xian Luocheng Zhen Song 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Clearance of Song Tombs at Luocheng, Guanghan County, Sichuan)," *Archaeology*, no. 2, pp. 123–13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井研縣文物管理所

2012 〈四川井研縣金井坪宋代墓地發掘簡報〉，《四川文物》，1期，頁19-36。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Jingyan Xian wenwu guanlisuo (Jingyan Coun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2012 "Sichuan Jingyan Xian Jinjingping Songdai mudi fajue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ong Cemetery at Jinjingping, Jingyan County, Sichuan),"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19–3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元市文物局、廣元市博物館

2020 〈四川廣元市水櫃村南宋王光祖墓〉，《考古》，2期，頁70-82。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Guangyuan Shi wenwuju (Guangyuan City Cultural Relics Bureau), and Guangyuan Museum

2020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mb of Wang Guangzu at Shuigui Village, Guangyuan City, Sichuan," *Archaeology*, no. 2, pp. 70–8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

2008 《華鎣安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Guangan Shi wenwuju (Guangan City Cultural Relics Bureau), and Huaying Shi wenwu guanlisuo (Huaying Ci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2008 *The Tomb of Anbing at Huayi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3 〈前蜀晉暉墓清理簡報〉，《考古》，10期，頁915-918、9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chuan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1983 “Qianshu Jin Hui 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Clearance of Jin Hui Tomb from the Former Shu),” *Archaeology*, no. 10, pp. 915–918, 907.
《四川古陶瓷研究》編輯組編
1984 《四川古陶瓷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ichuan gu taoci yanjiu bianjizu (Editorial Board of Research on Ancient Ceramics in Sichuan), ed.
1984 *Sichuan gu taoci yanjiu* (Research on Ancient Ceramics in Sichuan), Chengdu: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四川省博物館
1980 〈四川萬縣唐墓〉，《考古學報》，4期，頁503-514。
Sichuan Provincial Museum
1980 “A Tang Tomb at Wanx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cta Archaeologia Sinica*, no. 4, pp. 503–514.
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1958 〈四川彭山後蜀宋琳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5期，頁18-26。
Sichuan Sheng bowuguan wenwu gongzuodui (Sichuan Provincial Museum Cultural Relics Team)
1958 “Sichuan Pengshan Houshu Song Lin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Lin Tomb from the Later Shu at Pengshan, Sichuan),” *Archaeology*, no. 5, pp. 18–26.
白彬
2006 〈雷神俑考〉，《四川文物》，6期，頁66-75。
2007 〈四川五代兩宋墓葬中的豬首人身俑〉，《四川文物》，3期，頁56-60。
Bai, Bin
2006 “Leishenyong kao (Study on Thunder God Figurines),”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66–75.
2007 “Sichuan Wudai liang Song muzang zhong de zhushou renshen yong (Pig-Headed Human-Bodied Figurines in Sichuan Tomb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56–60.
白彬、談北平
2020 〈宋元墓葬的「金雞」「玉犬」〉，《南方民族考古》，第20輯，頁275-317。
Bai, Bin, and Beiping Tan
2020 “Song Yuan muzang de ‘Jinji’ ‘Yuquan’ (Golden Rooster and Jade Dog in Song-Yuan Tombs),”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20, pp. 275–31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2002 〈唐姚無陂墓發掘簡報〉，《文物》，12期，頁72-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2002 “Excavation of Yao Wupo’s Tomb of the Tang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72–81.
江西省博物館
2016 〈進賢縣北宋政和八年墓〉，收入《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0-121。
2016 〈南豐縣北宋政和八年墓〉，收入《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22-151。
Jiangxi Provincial Museum
2016 “Jinxian Xian Beisong Zhenghe banian mu (The Northern Song Tomb dated to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enghe reign at Jinxian County),” in *Dated Tombs and Dated Bluish-White Glazed Porcelain Wares of the Song Dynasty Found in Jiangx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10–121.
2016 “Nanfeng Xian Beisong Zhenghe banian mu (The Northern Song Tomb dated to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enghe reign at Nanfeng County),” in *Dated Tombs and Dated Bluish-White Glazed Porcelain Wares of the Song Dynasty Found in Jiangx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22–15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7 〈成都市武侯區川音大廈工地唐宋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591-641。
2017 〈成都市成華區成華廣場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694-714。
2019 〈成都市錦江區沙河堡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79-414。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2017 “Chengdu Shi Wuhou Qu Chuanyin dasha gongdi Tang Song muzang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ang and Song Tombs at the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Tower Construction Site, Wuhou District,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15*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15),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591–641.
2017 “Chengdu Shi Chenghua Qu Chenghua guangchang 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Tombs at Chenghua Plaza, Chenghua District,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15*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15),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694–714.
2019 “Chengdu Shi Jinjiang Qu Shahebu 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Tombs at Shahebu, Jinjiang District,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1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17),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79–4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龍泉驛區文物保護管理所
2011 〈成都市龍泉驛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婦墓〉，《考古》，6期，頁33-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ngd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Commission for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of Longquanyi District

2011 "The Joint Tomb of Wang Zongkan and His Wife of the Former Shu Kingdom in the Five-Dynasties Period in Longquanyi District, Chengdu City," *Archaeology*, no. 6, pp. 33–4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雙流縣文物管理所

2006 〈成都雙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後蜀雙室合葬墓〉，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23-363。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huangliu County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2006 "Chengdu Shuangliu Jitian Zhulincun Wudai Houshu shuangshi hezang mu (A Five Dynasties Later Shu Double-Chamber Joint Burial Tomb at Zhulin Village, Jitian, Shuangliu,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4*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4),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23–363.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

2003 〈成都市成華區三聖鄉花果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1》，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00-235。

Chengdu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ork Team

2003 "Chengdu Shi Chenghua Qu Sansheng Xiang Huaguocun Song mu fajue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Song Tombs at Huaguo Village, Sansheng Township, Chengua District, Chengdu City),"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1*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1),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00–23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崇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2019 〈崇州市同心村宋墓群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34-353。

Chengdu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ork Team, and Chongzhou Shi wenwu baohu guanlisuo (Chongzhou Cit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fice)

2019 "Chongzhou Shi Tongxincun Song muqun fajue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Song Tomb Group at Tongxin Village, Chongzhou City),"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7),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34–35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 〈成都市保和鄉東桂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59-383。

2005 〈成都市西郊外化成小區唐宋墓葬的清理〉，《考古》，10期，頁47-56。

2005 〈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66-3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5 〈成都市青龍鄉石嶺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97-417。

2006 〈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文物》，12期，頁52-67。

2006 〈信息產業部三十研究所南宋火葬墓的發掘〉，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433-451。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2004 "Chengdu Shi Baohe Xiang Dongguicun 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Tombs at Donggui Village, Baohe Township,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2*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2),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59–383.

2005 "Excavation of Tang and Song Tombs at Waihuacheng Neighborhood in the Western Suburb of Chengdu City," *Archaeology*, no. 10, pp. 47–56.

2005 "Chengdu Shi Qinglong Xiang Haibincun muzang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s at Haibin Village, Qinglong Township,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3*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3),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66–307.

2005 "Chengdu Shi Qinglong Xiang Shilingcun 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Tombs at Shiling Village, Qinglong Township,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3*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3),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97–417.

2006 "Sichuan Chengdu Beisong Song Jing fufu mu (The Northern Song Tomb of Song Jing and His Wife at Chengdu,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52–67.

2006 "Xinxi chanyebu sanshi yanjiusuo Nansong huozang mu de fajue (Excavation of a Southern Song Cremation Tomb at the No. 30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4*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4),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433–45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

2004 〈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考古》，5期，頁55-64。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Chengdu Municipal Archaeological Team

2004 "Excavation of a Southern Song tomb at Erxianqiao in Chengdu City," *Archaeology*, no. 5, pp. 55–6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

2004 〈新津縣鄧雙鄉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84-401。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Xinjin Xian wenwu guanlisuo (Xinjin County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2004 "Xinjin Xian Dengshuang Xiang Beisong shishi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a Northern Song Stone-Chamber Tomb at Dengshuang Township, Xinjin County),"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2002*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2002),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84–401.

成都市文物管理處

1982 〈成都市東郊後蜀張虔釗墓〉,《文物》,3期,頁21-27。

Chengdu Shi wenwu guanlichu (Chengdu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1982 "Chengdu Shi dongjiao Houshu Zhang Qianzhao mu (The Later Shu Tomb of Zhang Qianzhao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Chengdu),"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21–27.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

1991 〈五代後蜀孫漢韶墓〉,《文物》,5期,頁11-26。

Chengdu Shi bowuguan kaogudui (Chengdu Municipal Museum Archaeological Team)

1991 "Wudai Houshu Sun Hanshao mu (The Tomb of Sun Hanshao from the Later Shu of the Five Dynasties),"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11–26.

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翁善良、羅偉先

1990 〈成都東郊北宋張確夫婦墓〉,《文物》,3期,頁1-13。

Chengdu Shi bowuguan kaogudui (Chengdu Municipal Museum Archaeological Team), Shanliang Weng, and Weixian Luo

1990 "Chengdu dongjiao Beisong Zhang Que fufu mu (The Northern Song Tomb of Zhang Que and His Wife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Chengdu),"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1–13.

朱章義、劉雨茂、毛求學

2001 〈成都市龍泉驛區青龍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78-294。

Zhu, Zhangyi, Yumao Liu, and Qiuxue Mao

2001 "Chengdu Shi Longquanyi Qu Qinglongcun 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Tombs at Qinglong Village, Longquanyi District,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1999*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1999),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78–294.

李子春

1958 〈唐武三思之鎮墓石〉,《人文襍誌》,2期,頁109、87。

Li, Zichun

1958 "The Tomb-quelling Stone of Wu Sansi of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2, pp. 109, 87.

何介鈞、文道義

1964 〈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2期,頁633-634。

He, Jiejun, and Daoyi Wen

1964 "Hunan Changsha Niujiaotang Tang mu (The Tang Dynasty Tombs at Niujiaotang, Changsha, Hunan)," *Archaeology*, no. 12, pp. 633–6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月馨
2016 〈隋唐墓葬出土帳構研究〉,《中原文物》,2期,頁94-100。
He, Yuexin
2016 "On the Curtains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2, pp. 94–100.
吳炎亮
2013 〈試析遼寧朝陽地區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文物》,6期,頁50-56。
Wu, Yanliang
2013 "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omb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Chaoyang Area, Liaoning,"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50–56.
李知宴
2002 〈論邛窯彩繪瓷的藝術風格〉,收入耿寶昌主編,《邛窯古陶瓷研究》,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頁25-31。
Li, Zhiyan
2002 "Lun Qiongyao caihui ci de yishu fengge (On the Artistic Style of Painted Porcelain from the Qiong Kilns)," in Geng Baochang, ed., *Qiongyao gu taoci yanjiu* (Studies on Ancient Ceramics from the Qiong Kilns), Hef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pp. 25–31.
邱衍文
1984 《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北:郁氏印書及獎學基金會。
Qiu, Yanwen
1984 *Tang Kaiyuan Li zhong sangli zhi Yanjiu* (A Study of Funerary Rites in the Kaiyuan Ritual of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Yushi yinshu ji jiangxue jijinhui (Yu Family Printing and Scholarship Foundation).
李復華、江學禮
1956 〈四川綿陽平政橋發現宋墓〉,《考古通訊》,5期,頁49-50。
Li, Fuhua, and Xueli Jiang
1956 "Sichuan Mianyang Pingzhengqiao faxian Song mu (Discovery of a Song Tomb at Pingzheng Bridge, Mianyang, Sichuan)," *Archaeology*, no. 5, pp. 49–50.
李燁、周忠慶
2007 〈陝西洋縣南宋彭杲夫婦墓〉,《文物》,8期,頁57-70。
Li, Ye, and Zhongqing Zhou
2007 "The Southern Song Tomb of Peng Gao and His Wife at Yangxian,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57–70.
吳麗娛
2016 《禮與中國古代社會:隋唐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Wu, Liyu
2016 *Li yu Zhongguo gudai shehui: Sui Tang Wudai Song Yuan juan* (Ritual and Society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cient China: Volume on the Sui,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孟原召

2007 〈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鐵牛鐵豬〉,《中原文物》,1期,頁72-79。

Meng, Yuanzhao

2007 "On the Iron Cow and Pig Unearthed in Tombs from the Tang to Yuan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1, pp. 72–79.

沈睿文

2022 〈唐宋墓葬神煞考源〉,收入氏著,《墓葬中的禮與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9-71。

Shen, Ruiwen

2022 "Tang Song muzang shensha kaoyua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omb Deities in Tang and Song Tombs)," in Shen Ruiwen, *Muzang zhong de li yu su* (Ritual and Custom in Tomb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Shanghai Classic Press), pp. 49–71.

呼嘯

2022 〈唐代三彩庭院的初步研究:從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徵集三彩庭院說起〉,《南方文物》,2期,頁285-290。

Hu, Xiao

2022 "Tangdai sancai tingyuan de chubu yanjiu: cong Shaanxi lishi bowuguan xin zhengjii sancai tingyuan shuoqi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ng Sancai Courtyard Models: Beginning from Newly Acquired Sancai Courtyards at the Shaanxi History Museum),"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no. 2, pp. 285–290.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0 〈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簡報〉,《考古》,3期,頁34-38。

1964 〈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期,頁7-33。

Shaanxi Sheng wenwu guanli weiyuanhui (Sha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1960 "Xi'an xijiao Zhongbaocun Tang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a Tang Tomb at Zhongbaocun, Western Suburbs of Xi'an)," *Archaeology*, no. 3, pp. 34–38.

1964 "Tang Yongtai gongzhu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omb of Tang Princess Yongta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7–3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2004 《唐節愍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Fuping Xian wenwu guanli weiyuanhui (Fuping Coun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2004 *The Tomb of Prince Jiemin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Science Press.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8 《唐長安醴泉坊三彩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6 《唐懿德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8 《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8 *The Kiln Site of Tricolor-Glazed Pottery at Liquanfang in Chang'an Capital City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6 *Tang Yide taizi mu fajue baog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omb of Tang Crown Prince Yid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8 *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Liu Heima's Family Cemete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陝西省博物館等
1972 〈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7期，頁13-25。
1972 〈唐鄭仁泰墓發掘簡報〉，《文物》，7期，頁33-42。
Shaanxi Provincial Museum et al.
1972 "Tang Zhanghuai taizi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omb of Tang Crown Prince Zhanghuai),"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13–25.
1972 "Tang Zheng Rentai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ang Tomb of Zheng Rentai),"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33–42.
姜捷
2003 〈關於定陵陵制的幾個新因素〉，《考古與文物》，1期，頁69-74、82。
Jiang, Jie
2003 "Guanyu Dingling lingzhi de jige xin yinsu (Several New Factors Concerning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Dingling),"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69–74, 82.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2014 〈重慶市合川區觀山墓群宋代石室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期，頁29-36。
Chongqing Shi wenhua yichan yanjiuyuan (Chongq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Chongqing wenhua yichan baohu zhongxin (Chongqing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Center)
2014 "Chongqing Shi Hechuan Qu Guanshan muqun Songdai shishi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Song Stone-Chamber Tombs at the Guanshan Tomb Cluster, He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29–36.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市永川區文物管理所
2020 〈重慶永川高洞子南宋墓群清理簡報〉，《文物》，6期，頁25-40。
Chongqing Shi wenhua yichan yanjiuyuan (Chongq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Chongqing Shi Yongchuan Qu wenwu guanlisuo (Chongqing Municipal Yongchuan District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2020 "Excavation Report on a Southern Song Tomb Cluster at Gaodongzi, Yongchuan, Chongqing,"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25–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昭陵文物管理所
1977 〈唐越王李貞墓發掘簡報〉,《文物》,10期,頁41-49。
Zhaoling wenwu guanlisuo (Zhaoling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1977 "Tang Yue wang Li Zhen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Prince Yue Li Zhen's Tomb from the Tang),"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41–49.
昭陵博物館
2000 〈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3期,頁3-14。
Zhaoling Museum
2000 "Tang Zhaoling Li Ji [Xu Maogong]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omb of Li Ji [Xu Maogong] at Tang Zhaoling),"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3–14.
唐山
1984 〈江西南豐宋墓出土瓷器與南豐窯〉,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02-105。
Tang, Shan
1984 "Jiangxi Nanfeng Song mu chutu ciqi yu Nanfeng yao (Porcelain from Song Tombs at Nanfeng, Jiangxi, and the Nanfeng Kilns)," in Wenwu bianji weiyuanhui (Cultural Relics Editorial Committee), ed., *Zhongguo gudai yaozhi diaocha fajue baogao ji* (Collected Reports on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of Ancient Kiln Sites in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02–105.
唐正建主編
2011 《《天聖令》與唐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Tang, Zhengjian, ed.
2011 *Tiansheng ling yu Tang-Song zhidu yanjiu* (The Tiansheng Statutes and Research on Tang-Song Institu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孫杰、王寧
2022 〈成都十陵鎮後蜀趙廷隱墓出土陶質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文物天地》,6期,頁33。
Sun, Jie, and Ning Wang
2022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eramic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Later Shu Tomb of Zhao Tingyin at Shiling Township, Chengdu," *Cultural Relics World*, no. 6, p. 33.
高明士
2013 〈「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漢學研究》,第31卷第1期,頁69-99。
Kao, Ming-shih
2013 "The 'Tiansheng Statut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Chinese Studies*, vol. 31, no. 1, pp. 69–99.
袁泉
2013 〈洛渭地區蒙元墓隨葬明器之政治與文化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頁6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uan, Quan
2013 “A Study of Yuan Dynasty Burial Objects from Luo-Wei Region in a Political-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no. 10, pp. 61–78.
徐胭胭
2017 〈媒介的競爭：唐三彩與唐代墓葬制度〉,《古代墓葬美術研究》, 第4輯，頁229-241。
Xu, Yanyan
2017 “Rivalry among Materials as Media-Tricolor Glazed Ceramics and Burial Systems of the Tang Dynasty,” *Studies on Ancient Tomb Art*, vol. 4, pp. 229–241.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6 《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 《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8 〈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 3期，頁15-29。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2016 *Tang Wang Xiongdan furen Wei shi mu* (The Tomb of Lady Wei, Wife of Wang Xiongdan of the Tang Dynasty at Luoyang),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Press.
2017 *Luoyang Longmen Tang An Pu fufu mu* (The Tang Tomb of An Pu and His Wife at Longmen, Luo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8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Lady Wei, the Wife of Wang Xiongdan in Tang Dynasty, in Luoyang City,” *Huaxia Archaeology*, no. 3, pp. 15–29.
陳定榮
1986 〈論江西宋墓出土的陶瓷俑〉,《江西歷史文物》, S1期，頁89-95、88。
1988 〈江西南豐縣桑田宋墓〉,《考古》, 4期，頁318-328。
Chen, Dingrong
1986 “Lun Jiangxi Song mu chutu de taoci yong (On Ceramic Figurines Unearthed from Song Tombs in Jiangxi),” *Jiangxi Historical Cultural Relics*, no. S1, pp. 89–95, 88.
1988 “Jiangxi Nanfeng Xian Sangtian Song mu (A Song Tomb at Sangtian, Nanfeng County, Jiangxi),” *Archaeology*, no. 4, pp. 318–328.
耿超
2010 〈唐宋墓葬中的觀風鳥研究〉,《華夏考古》, 2期，頁112-119。
Geng, Chao
2010 “A Study of Tomb-Figurines of Birds in Tang and Song Graves,” *Huaxia Archaeology*, no. 2, pp. 112–119.
徐斐宏
2024 〈論兩湖地區隋唐墓葬出土盟器神煞的構成與變遷〉,《南方文物》, 2期，頁154-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Xu, Feihong
2024 "The Composition and Changes of the Meng Qi Shen Sha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Hunan and Hubei,"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no. 2, pp. 154–169.

陳雲洪
2011 〈四川地區宋代墓葬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頁279-304。

Chen, Yunhong
2011 "A Study on Song Tombs in Sichuan," *South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7, pp. 279–304.

氣賀澤保規
2012 〈新發現的彭尊師墓誌及其鎮墓石——兼論日本明治大學所藏墓誌石刻〉,《唐史論叢》,1期,頁69-80。

Kegasawa, Yasunori
2012 "Xin faxian de Peng zunshi muzhi ji qi zhenmushi: jian lun Riben Mingzhi daxue suo cang muzhi shike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and Tomb-Quelling Stone of Master Peng: With a Discussion of Epitaph Stone Carvings Held at Meiji University, Japan)," *Tang History Studies*, no. 1, pp. 69–80.

徐蘋芳
1963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2期,頁87-106。
1995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收入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頁277-314。

Xu, Pingfang
1963 "Tang Song muzang zhong de 'Mingqi Shensha' yu 'Muyi' zhidu: du *Dahan Yuanling Mizang jing zhaji* (The System of 'Mingqi Spirit Deitie' and 'Tomb Ritual' in Tang and Song Tombs: Notes on Reading the *Great Han Yuanling Secret Burial Classic*)," *Archaeology*, no. 2, pp. 87–106.
1995 "Tang Song muzang zhong de 'Mingqi Shensha' yu 'Muyi' zhidu: du *Dahan Yuanling Mizang jing* zhaji (The System of 'Mingqi Spirit Deities' and 'Tomb Ritual' in Tang and Song Tombs: Notes on Reading the *Great Han Yuanling Secret Burial Classic*)," in Xu Pingfang, *Zhongguo lishi kaoguxue luncong*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Taipei: Yunchen Culture, pp. 277–314.

陳顯雙、廖啟清
1986 〈四川蒲江縣五星鎮宋墓清理記〉,《考古與文物》,3期,頁37-47。

Chen, Xianshuang, and Qiqing Liao
1986 "Sichuan Pujiang Xian Wuxing Zhen Song mu qingli ji (Record of the Clearance of a Song Tomb at Wuxing Township, Pujiang County, Sichua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37–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文昌
2012 《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Zhang, Wen-chang
2012 *Establishing 'Li' to Civilize 'Tien-hsia': Ritual Book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in Tang-Song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宿白
1957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u, Bai
1957 *Baisha Song mu* (Song Tombs at Baish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張永珍
2022 〈唐墓地軸的再認識——兼談唐代鎮墓俑組合〉，《四川文物》，4期，頁68-76。
Zhang, Yongzhen
2022 "Rethinking of Dizhou in Tang Tombs: Also on the Combination of Tomb-Guarding Figurines in Tang Dynasty,"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68–76.
張全民
2013 〈《唐故普康公主墓誌銘》與道教五方真文鎮墓石〉，《唐史論叢》，1期，頁234-244。
Zhang, Quanmin
2013 "The Epitaph of the Late Tang Princess Pukang and the Daoist Five-Direction Zhenwen Tomb-Quelling Stones," *Tang History Studies*, no. 1, pp. 234–244.
章紅梅
2015 〈〈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釋錄校補〉，《考古與文物》，3期，頁103-106。
Zhang, Hongmei
2015 "Complement of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of a Southern Song tomb at Erxianqiao in Chengdu City,"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103–106.
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6 〈河南偃師縣隋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1期，頁994-999、993。
Yanshi Coun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1986 "Excavation Report on Sui and Tang Tombs in Yanshi County, Henan," *Archaeology*, no. 11, pp. 994–999, 993.
許雅惠
2003 〈《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頁1-26。
2017 〈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臺大歷史學報》，第60期，頁57-117。
Hsu, Ya-hwei
2003 "The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the *Hsüan-ho po-ku-t'u*-earthenware from the Tomb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ai-yin Ch'ih-ta-hu and the *Shao-hsi chou-hsien shih-tien i-t'u*,"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14, pp. 1–26.

2017 "The *Sanli tu*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Periods: Formats and Fun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Antiquarian Type of Ritual Objects," *Historical Inquiry*, no. 60, pp. 57–117.

張超然

2010 〈早期道教喪葬儀式的形成〉,《輔仁宗教研究》,第20期,頁27-66。

Chang, Chao-Jan

2010 "The Formation of Early Daoist Funerary Rituals," *Fujen Religious Studies*, no. 20, pp. 27–66.

張勛燎

1992 〈川西宋墓和陝西、河南唐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頁119-148。

Zhang, Xunliao

1992 "Chuanxi Song mu he Shaanxi, Henan Tang mu chutu zhenmuweng shike zhi yanjiu (A Study of Tomb-Quelling Inscribed Stones Unearthed from Song Tombs in Western Sichuan and Tang Tombs in Shaanxi and Henan),"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5, pp. 119–148.

張勛燎、白彬

2006 〈川渝黔地區考古發現的河圖洛書與先天八卦圖研究〉,收入氏著,《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冊4,頁1063-1188。

2006 〈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與道教〉,收入氏著,《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冊6,頁1611-1750。

Zhang, Xunliao, and Bin Bai

2006 "Chuan Yu Qian diqu kaogu faxian de Hetu Luoshu yu xiantian Bagua tu yanjiu (A Study of River Chart, Luo Writing, and Anterior Heaven Bagua Diagrams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and Guizhou Region)," in *Zhongguo Daojiao kaogu* (Chinese Daoist Archaeology),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vol. 4, pp. 1063–1188.

2006 "Sui Tang Wudai Song Yuan muzang chutu shenguai yong yu Daojiao (Demonic Figurines Unearthed from Sui,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Tombs and Daoism)," in *Zhongguo daojiao kaogu* (Chinese Daoist Archaeology),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vol. 6, pp. 1611–1750.

張新月等

2007 〈鞏義出土的唐代題字俑〉,《中原文物》,2期,頁81-87。

Zhang, Xinyue et al.

2007 "On the Tomb Figures with Characters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Gongyi,"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2, pp. 8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蘊、秦造垣
2009 〈淺談「下帳」〉,《考古與文物》,6期,頁46-48。
Zhang, Yun, and Zaoyuan Qin
2009 "Qian tan 'Xiazhang'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Xiazhang'),"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46–48.
曹騰騑、阮應祺、鄧杰昌
1982 〈廣東海康元墓出土的陰線刻磚〉,《考古學集刊》,第2期,頁171-180。
Cao, Tengfei, Yingqi Ruan, and Jiechang Deng
1982 "Engraved Line Bricks Unearthed from a Yuan Tomb at Haikang, Guangdong," *Archaeological Collectanea*, no. 2, pp. 171–180.
湖北省博物館、鄖縣博物館
1987 〈湖北鄖縣唐李徽、閻婉墓發掘簡報〉,《文物》,8期,頁30-42、51。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and Yunxian Museum
1987 "Hubei Yun Xian Tang Li Hui, Yan Wan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Tang Tombs of Li Hui and Yan Wan at Yun Xian, Hubei),"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30–42, 51.
富平縣文化館等
1977 〈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5期,頁313-326。
Fuping Xian wenhuaguan (Fuping County Cultural Center) et al.
1977 "Tang Li Fe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Li Feng Tomb from the Tang)," *Archaeology*, no. 5, pp. 313–326.
馮先成、程遠福、張丙奎
2001 〈成都市外化成小區南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42-251。
Feng, Xiancheng, Yuanfu Cheng, and Bingkui Zhang
2001 "Chengdu Shi Waihuacheng xiaoqu Nansong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a Southern Song Tomb at the Waihuacheng Residential Complex, Chengdu)," in *Chengdu kaogu faxian 1999*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engdu 1999),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42–251.
程義
2011 〈談唐代喪葬文獻中的「下帳」〉,《中國文物報》,2011年7月22日,第6版。
2012 《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Cheng, Yi
2011 "Tan Tangdai sangsang wenxian zhong de 'Xiazhang' (On the 'Xiazhang' in Tang Funerary Documents)," *China Cultural Relics News*, July 22, p. 6.
2012 *Guanzhong diqu Tangdai muzang yanjiu* (A Study of Tang Dynasty Tomb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程義、鄭紅莉
2012 〈《唐令喪葬令》諸明器條復原的再檢討〉,《中原文物》，5期，頁79-86。
Cheng, Yi, and Hongli Zheng
2012 "Ri-discussion on the Burial Objects Article in fumeral Law of Tang Dynasty Rcovering,"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5, pp. 79–86.
彭適凡、唐昌樸
1980 〈江西發現幾座北宋紀年墓〉,《文物》，5期，頁28-33。
Peng, Shifan, and Changpu Tang
1980 "Jiangxi faxian ji zuo Beisong jinian mu (Discovery of Several Dated Northern Song Tombs in Jiangxi),"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28–33.
傅漢良
1956 〈成都外東跳蹬河發現宋代墓葬〉,《考古通訊》，6期，頁72-76。
Fu, Hanliang
1956 "Chengdu wai dong Tiaodenghe faxian Songdai muzang (Discovery of Song Dynasty Tombs at Tiaodenghe, Eastern Chengdu)," *Archaeology*, no. 6, pp. 72–76.
馮漢驥
2002 《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Feng, Hanji
2002 *The Royal Tomb of Wang Jian of the Former Sh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1976 《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bianjib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Shin Wen Feng Print Co.), ed.
1976 *Qingyuan tiaofa shilei*,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漢中市博物館
1989 〈漢中八里橋水庫清理一座宋墓〉,《文博》，1期，頁42-43。
Hanzhong Municipal Museum
1989 "Hanzhong Baliqiao shuiku qingli yizuo Song mu (Clearance of a Song Tomb at Balihe Reservoir, Hanzhong)," *Relics and Museolgy*, no. 1, pp. 42–43.
鄧天富
1991 〈北川縣香泉宋墓〉,《四川文物》，5期，頁70-72。
Deng, Tianfu
1991 "Beichuan Xian Xiangquan Song mu (A Song Tomb at Xiangquan, Beichuan County),"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70–72.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 《中國古代鎮墓神物》北京：文物出版社。
Zhe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2004 *Zhongguo gudai zhenmu shenwu* (Ancient Chinese Tomb-Quelling Sacred Object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齊東方
2001 〈中國北方地區唐墓〉，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編，《7-8世紀東亞地區歷史與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8-15。
2006 〈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1期，頁59-82。
2010 〈唐代縣令墓研究〉，《古代文明》，頁220-254。
Qi, Dongfang
2001 "Zhongguo beifang diqu Tang mu (Tang Tombs in Northern China)," i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nd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East Asia in the 7th–8th Centuries*,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8–15.
2006 "A Study of the Tang Period Funeral Concept, Custom and Ritual Institutio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1, pp. 59–82.
2010 "Research on Burials of County Magistrat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cient Civilizations*, pp. 220–254.
鄭德坤、沈維鈞
1933 《中國明器》，北平：哈佛燕京社。
Cheng, Te-K'un, and Weijun Shen
1933 *Zhongguo mingqi* (Chinese Mingqi), Beiping: Harvard-Yenching Society.
劉未
2021 〈實物、圖像與文本：宋元時期的墓葬神煞〉，《故宮博物院院刊》，11期，頁59-80。
2024 〈南陵宋墓與士人葬儀〉，《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7期，頁86-100。
Liu, Wei
2021 "Objects, Images and Texts: The Song-Yuan Period's Tomb Deities and Devil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1, pp. 59–80.
2024 "Song Dynasty Tombs at Nanling County and Funerary Rituals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no. 7, pp. 86–100.
劉屹
2011 〈唐代的靈寶五方鎮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唐李義珪五方鎮墓石」為線索〉，《唐研究》，第17卷，頁7-38。
Liu, Yi
2011 "A Study of the Lingbao Five-Direction Tomb-Quelling Stones of the Tang Dynasty: Using the 'Tang Li Yigui Five-Direction Tomb-Quelling Ston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Datang Xishi Museum as a Clue,"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vol. 17, pp. 7–38.
魯西奇
2014 《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u, Xiqi
2014 *Zhongguo gudai maidi quan yanjiu*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and Purchase Contracts),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劉志巖
2008 〈四川彭山正華村宋墓發掘取得重要收獲〉,《四川文物》, 4期，頁95-96。
Liu, Zhiyan
2008 "Sichuan Pengshan Zhenghuacun Song mu fajue qude zhongyao shouhuo (Significant Finds from the Excavation of a Song Tomb at Zhenghua Village, Pengshan, Sichuan),"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95–96.
劉雨茂、朱章義
2009 〈四川地區唐代磚室墓分期研究初論〉,《成都考古研究》, 頁515-527。
Liu, Yumao, and Zhangyi Zhu
2009 "Sichuan diqu Tangdai zhuanshi mu fenqi yanjiu chulu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Tang Dynasty Brick-Chamber Tombs in the Sichuan Region)," *Chengdu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515–527.
劉雨茂、榮遠大
1999 〈北宋宋構夫婦墓葬的發現與初步研究〉,《四川文物》, 3期，頁77-81。
Liu, Yumao, and Yuanda Rong
1999 "Beisong Song Gou fufu muzang de faxian yu chubu yanjiu (Discovery and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Northern Song Tomb of Song Gou and His Wife),"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77–81.
劉長源
1984 〈漢中市北郊石馬坡南宋墓清理記〉,《考古與文物》, 5期，頁56-62。
Liu, Changyuan
1984 "Hanzhong Shi beijiao Shimapou Nansong mu qingli ji (Record of the Clearance of a Southern Song Tomb at Shimapou, Northern Suburbs of Hanzhong),"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56–62.
劉昭慧
2015 〈試論唐墓壁龕與它的喪葬禮儀的功能〉,《古代墓葬美術研究》, 第3輯，頁185-195。
Liu, Chao-hui Jenny
2015 "On Tang Tomb Niches and Its Function in Funerary Rituals," *Studies on Ancient Tomb Art*, vol. 3, pp. 185–195.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
2012 《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Nar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2012 *Chaoyang Sui Tang muzang faxian yu yanji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Sui and Tang Tombs in Chao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劉衛鵬

2011 〈兩方唐代鎮墓石考記〉,《考古與文物》, 2期，頁95–99。

Liu, Weipeng

2011 "Notes of Two Tomb Guardians of the Tang Dynasty,"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95–99.

盧亞輝

2020 〈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軸的考古學研究〉,《四川文物》, 5期，頁88-100。

2022 〈論兩湖地區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考古學集刊》, 第27集，頁176-200。

Lu, Yahui

2020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Dizhou Unearthed from Burials betwee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ong Dynasty,"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88–100.

2022 "Discussion of Guardian Figurines Unearthed from Sui and Tang Tombs in the Hubei and Hunan Regio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anea*, vol. 27, pp. 176–200.

龍騰

1996 〈蒲江北宋宋燧墓出土文物〉,《四川文物》, 5期，頁59-61。

1997 〈蒲江北宋魏忻、魏大升墓清理簡報〉,《四川文物》, 6期，頁72-74。

Long, Teng

1996 "Pujiang Beisong Song Sui mu chutu wenwu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mb of Song Sui at Pujiang),"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59–61.

1997 "Pujiang Beisong Wei Xin, Wei Dasheng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Northern Song Tombs of Wei Xin and Wei Dasheng at Pujiang),"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72–74.

謝明良

1985 〈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學美術史論集》, 第5輯，頁3-209。

1986 〈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故宮學術季刊》, 第3卷第3期，頁59-105。

2002 〈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 19卷4期，頁143-168。

2007 〈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 原載《藝術學》, 14期（1995）, 頁47-76，後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 臺北：允晨文化，頁18-34。

2014 〈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 收入氏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 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85-117。

2014 〈唐三彩的區域性消費〉, 收入氏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 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119-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21 〈隋唐墓出土的陶人面鳥〉,《故宮學術季刊》,39卷1期,頁1-38。

Hsieh, Ming-liang

1985 "Tō sansai no shomondai (Various Problems in Tang Sancai)," *Bigaku Bijutsushi Ronshū* (Collected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Art History), vol. 5, pp. 3–209.

1986 "Chutu wenwu suo jian Zhongguo shi'er zhishou de xingtai bianqian: Beichao zhi Wudai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Chinese Twelve Earthly Branch Creatures as Seen in Unearthed Artifact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Five Dynastie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 no. 3, pp. 59–105.

2002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gionalism in Northern Funerary Earthenware of the Yüan Dynasty: The Evidence of the Wang Shih-hsien Clan Tombs of Chang Count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19, no. 4, pp. 143–168.

2007 "Shanxi Tang mu chutu taoci chuta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Tang Tomb Unearthed Pottery in Shanxi)," *Study of the Arts*, no. 14 (1995), pp. 47–76, in Hsieh Ming-liang, *Zhongguo taocishi lu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Taipei: Yunchen, pp. 18–34.

2014 "Tang sancai de shiyongceng he xiaofei qingkuang —— yi liangjing diqu weili (The Social Strata of Use and Consumption of Tang Sancai: Taking the Two Capitals Region as an Example)," in *Zhongguo gudai qianyoutao de shijie: cong Zhanguo dao Tangdai* (The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Lead-Glazed Ceramic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pp. 85–117.

2014 "Tang sancai de quyuxing xiaofei (Regional Consumption of Tang Sancai)," in *Zhongguo gudai qianyoutao de shijie: cong Zhanguo dao Tangdai* (The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Lead-Glazed Ceramic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pp. 119–153.

2021 "Human-Head Bird Pottery Figurines Excavated from Sui and Tang Dynasty Tomb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9, no. 1, pp. 1–38.

小林仁

2024 〈唐代盛唐婦女俑考——女性イメージの成立と展開〉,發表於「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月26至27日。

Kobayashi, Hitoshi

2024 "Tōdai seitō fujoyō kō: josei imēji no seiritsu to tenkai (Study on Women's Figurines of the High Tang Perio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Image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rossing: New Approaches to the Material Cultures of the Sui and Tang Empires," Taipei: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October 2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加地有定
2005 《中国唐代鎮墓石の研究：死者の再生と崑崙山への昇仙》，大阪：かんぽう。
Kaji, Arisada
2005 *Chūgoku Tōdai chinboseki no kenkyū: shisha no saisei to Konronsan e no shōsen* (Research on Chinese Tang Dynasty Tomb-Suppressing Stones: The Deceased's Rebirth and Ascension to Kunlun Mountain), Osaka: Kanpo.
矢部良明
1979 〈晚唐五代の三彩〉，《考古學雜誌》，65卷3號，頁1-36。
Yabe, Ryomei
1979 "Bantō Godai no sansai (Sancai of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Journal of th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Nippon*, vol. 65, no. 3, pp. 1–36.
許雅惠著；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訳
2015 〈図籍の間接的流通再論——元代『三礼図』を例として——〉，收入近藤一成等編，《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十集，東京：汲古書院，頁267-301。
Hsu, Ya-hwei; Hara, Shintaro Alexandre, trans.
2015 "More on the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the Illustrated Book: The Case of the Sanli tu and Related Objects from the Yuan Period," in Kazunari Kondo et al., eds., *Chūgoku dentō shakai e no shikaku* (Perspectiv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Song History Study Group, vol. 10, Tokyo: Kyūko Shoin, pp. 267–30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
1986 《德興里高句麗壁画古墳》，東京：講談社。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1986 *Dekhung-ni Koguryo hekiga kofun* (The Goguryeo Mural Tomb at Deokheung-ri), Tokyo: Kodansha.
Cheng, Te-k'un
1957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wan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Carole
1996 "Inscribed Stones: A Note on a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rial Rit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82, no. 4/5, pp. 317–348.
Seidel, Anna
1987 "Post-mortem Immortality or: The Taoist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S. Shaked et al., eds., *Gilgul: Essays on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Leiden: E.J. Brill, pp. 223–237.
Shen, Hsueh-man
2005 "Body Matters: Manikin Burials in the Liao Tombs of Xuanhua, Hebei Province," *Artibus Asiae*, vol. 65, no. 1, pp. 99–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ahl, Helga
1994 “Su Shi’s Orthodox Burials: Interconnected Double Chamber Tombs in Sichuan,” in Dieter Kuhn, ed., *Burial in Song China*,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pp. 161–214.
Wu, Hung
2010 *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s: 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東北亞歷史網站
https://contents.nahf.or.kr/chinese/（檢索日期：2025年8月22日）。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6月30日等）。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檢索日期：2020年3月16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無頁碼。

圖2　東北亞歷史網站：http://contents.nahf.or.kr/chinese/item/level.do;JSESSIONID_NAHFHIS_WEB=77D41D95BFE8DCAAA87FCAE9C3B59579?levelId=kk.c_0002_0080_0050_0020（檢索日期：2025年8月22日）。

圖3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1175印本，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19，頁1。

圖4　劉未，〈實物、圖像與文本：宋元時期的墓葬神煞〉，《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11期，頁65，圖8。

圖5　陳顯雙、廖啟清，〈四川蒲江縣五星鎮宋墓清理記〉，《考古與文物》，1986年3期，頁41。

圖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新津縣鄧雙鄉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392，圖4；頁393，圖2-3。

圖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圖版69.1。

圖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圖版135.1-2。

圖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彩版2.3。

圖10　何介鈞、文道義，〈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12期，圖版8.4。

圖1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圖版23.1。

圖1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圖版23.2。

圖13　何介鈞、文道義，〈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圖版8.1-2。

圖1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版3.4。

圖1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287，圖18.1、18.3。

圖16　江西省博物館，〈南豐縣北宋政和八年墓〉，收入《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32。

圖17　東北亞歷史網站：http://contents.nahf.or.kr/chinese/item/level.do;JSESSIONID_NAHFHIS_WEB=909E94067CD037D2AF55367AE9AD91CC?levelId=k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_0002_0090_0040_0010；http://contents.nahf.or.kr/chinese/item/level.do?levelId=kk.c_0002_0090_0040_0020（檢索日期：2025年8月22日）。

圖1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圖版3.2。

圖19 鄧天富，〈北川縣香泉宋墓〉，《四川文物》，1991年5期，圖18。

圖20 江西省博物館，〈南豐縣北宋政和八年墓〉，頁146。

圖21 孫杰、王寧，〈成都十陵鎮後蜀趙廷隱墓出土陶質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文物天地》，2022年6期，頁33。

圖22 作者拍攝。

圖2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圖版2.1、2.3。

圖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保和鄉東桂村宋墓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374，圖12.2。

圖2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保和鄉東桂村宋墓發掘簡報〉，頁376，圖14.3。

圖26 鄧天富，〈北川縣香泉宋墓〉，頁71，圖17。

圖2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龍泉驛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成都市龍泉驛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婦墓〉，《考古》，2011年6期，頁38，圖5。

圖2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298。

圖2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龍鄉海濱村墓葬發掘簡報〉，頁303。

圖30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圖版43.3-4。

圖3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彩版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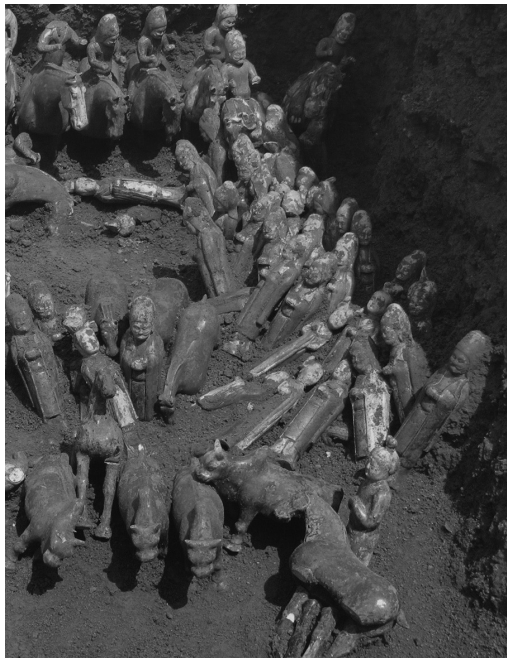


圖1　三彩陶俑　687年　河南洛陽鉅鹿郡太夫人魏氏墓



圖2　「地軸」畫像　高句麗廣開土王永樂十八年（408）　朝鮮德興里壁畫　一旁墨書「地軸一身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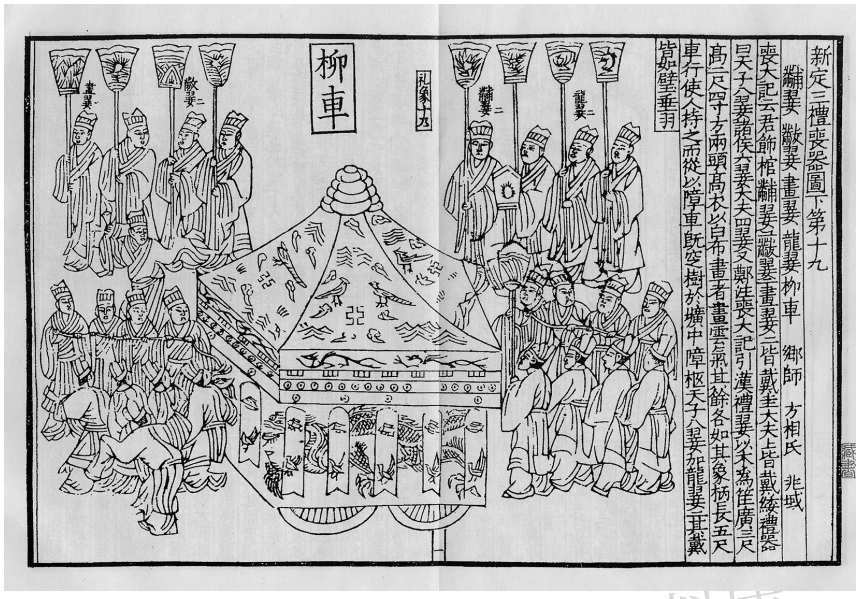


圖3　柳車　聶崇義　《新定三禮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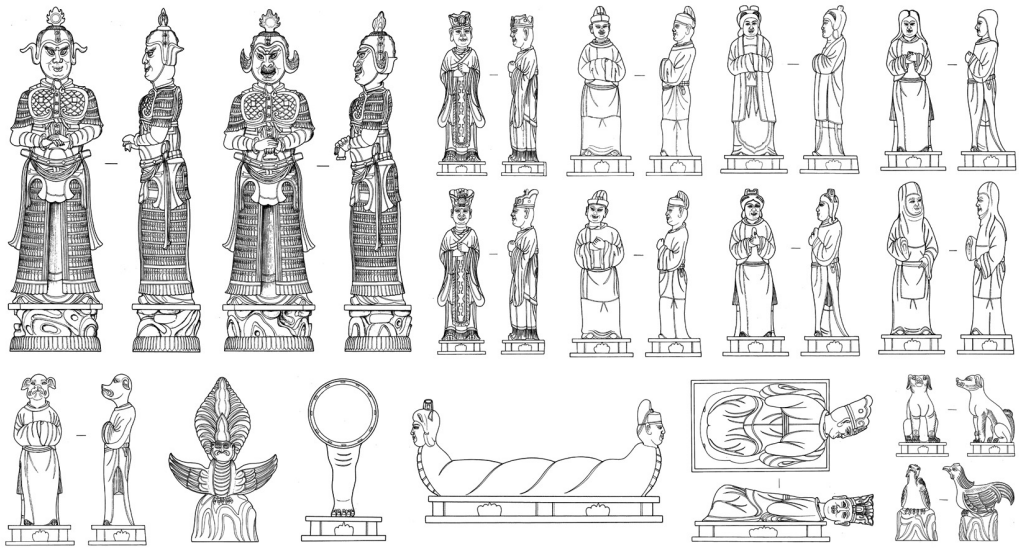


圖4　成套陶俑　四川成都雙流徐公夫婦墓出土　妻葬於939年、夫964年



圖5　三彩日、月寬袍人形神俑　1072年　高30-31公分
四川成都蒲江王□湜與史氏大娘夫婦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 「萬歲女」女立俑、「老人」女立俑、「地精」戴幞頭豬首人身俑 1081年 高30公分左右 四川成都新津王府君夫婦墓出土



圖7 三彩朱雀俑 1224年 殘高33.3公分 四川華鎣安丙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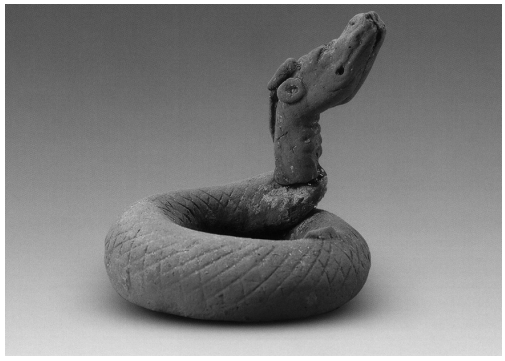




圖8　盤蛇形人首、獸首俑　1224年　高9.15、7.8公分　四川華鎣安寶孫墓出土



圖9　加彩武士俑　709年　高93公分
河南偃師杏園李嗣本墓出土



圖10　人首鳥身俑　唐代　高15公分
湖南長沙牛角塘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雙人首龍身俑　唐代　長24.6公分
遼寧朝陽中山營子村出土



圖12　人首魚身俑　唐代　長20.9公分
遼寧朝陽中山營子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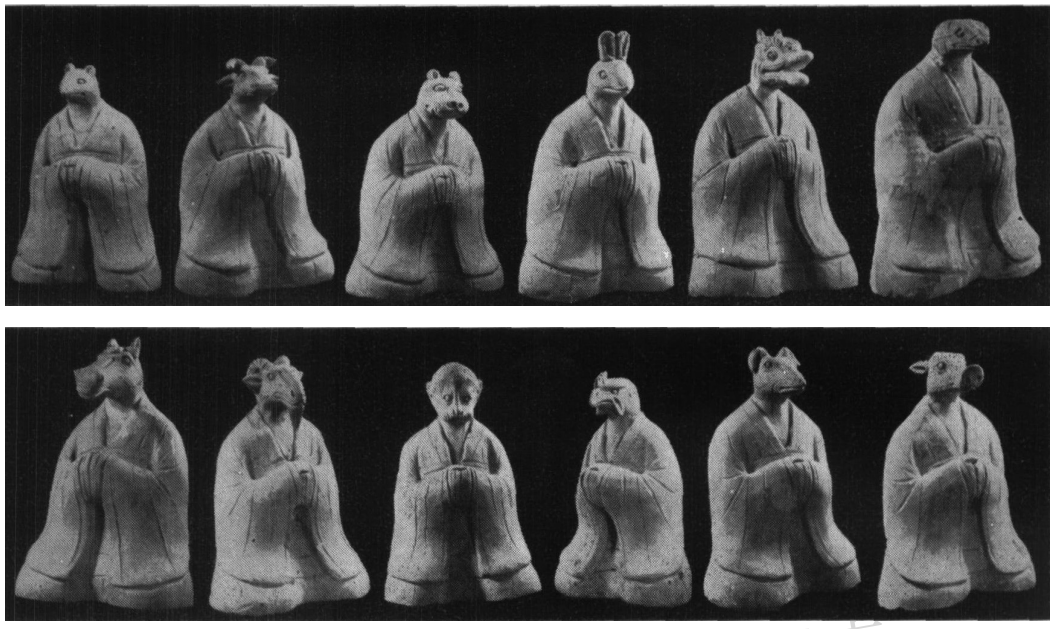


圖13　獸首人身十二生肖坐俑　唐代　高17公分左右　湖南長沙牛角塘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　雙人首蛇身地軸俑　1094年　通長22.4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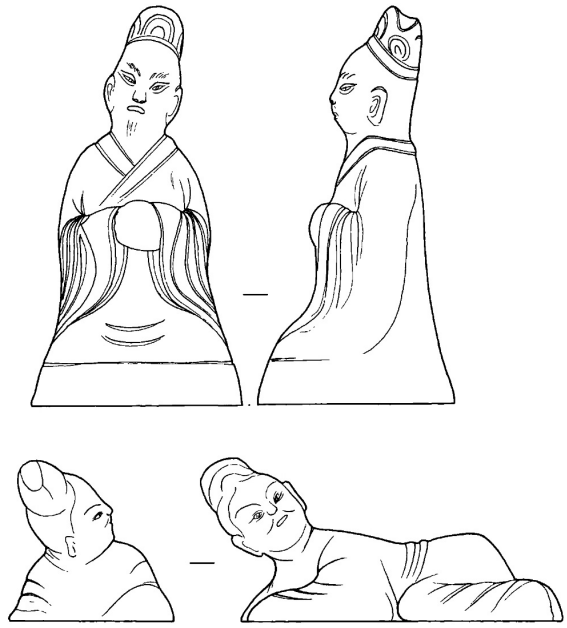


圖15　仰觀、伏聽　1094年　高19.6、10.2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　墨書「仰俑」、「伏聽」瓷俑　1118年　高18、5公分　江西南豐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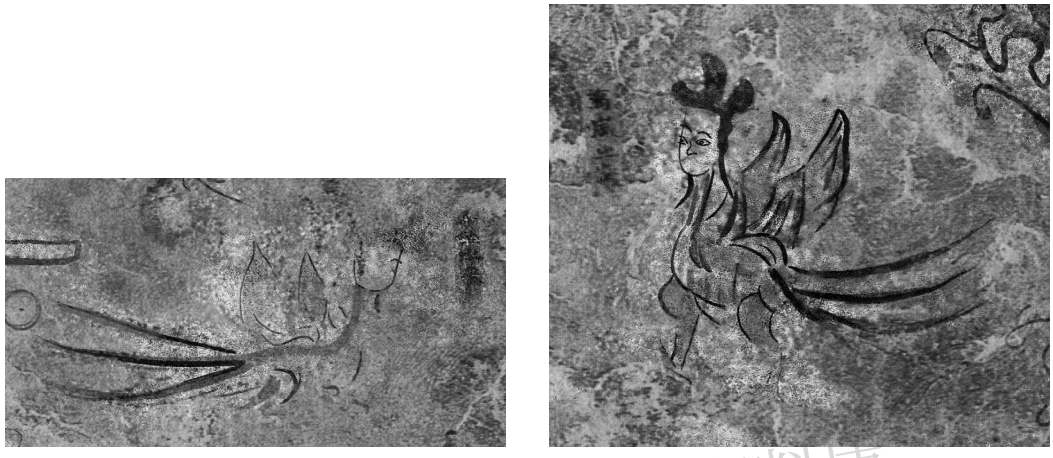


圖17　「千秋」、「萬歲」畫像　高句麗廣開土王永樂十八年（408）　朝鮮德興里壁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人首鳥身俑 1094年 高30.6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墓出土



圖19 三彩「王」字豬首人身坐俑 北宋
高18公分 四川北川縣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捧日文官俑　1118年　高28公分　江西南豐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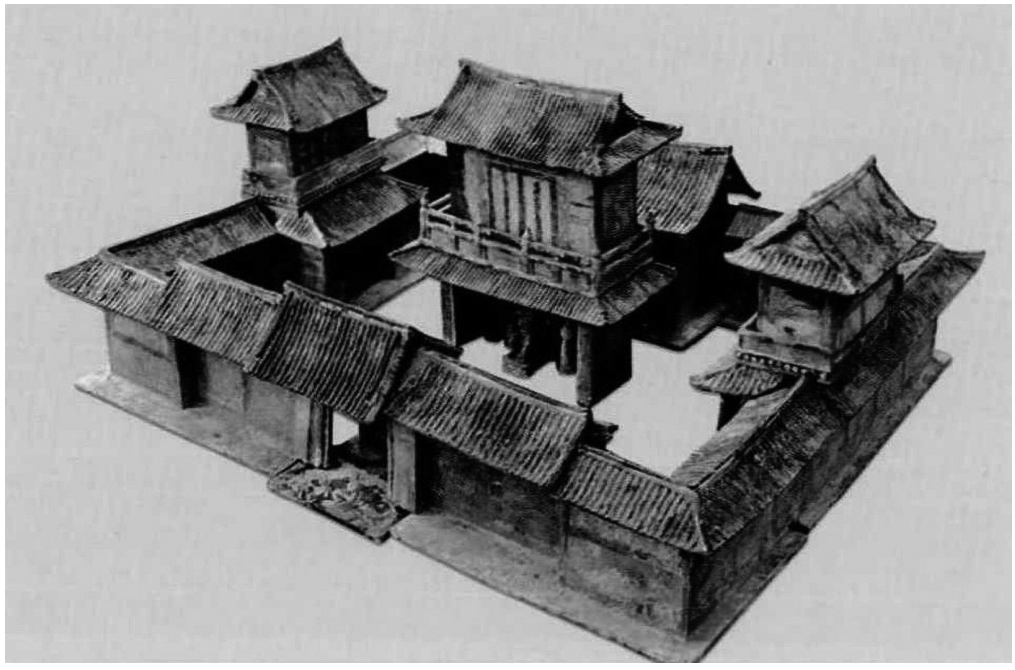


圖21　加彩灰陶園宅　951年　四川成都趙廷隱墓出土



圖22　綠釉「下帳」明器模型　1086–1094年　四川廣漢雒城出土　作者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　陶武士俑　1094年　通高96.6、94.8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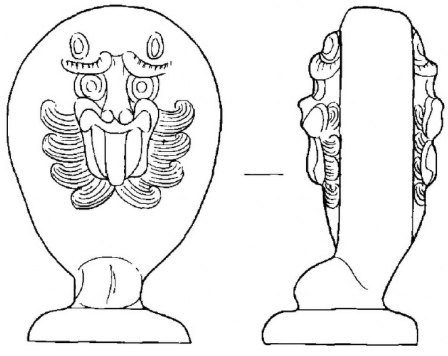


圖24　陶獨腳獸　北宋　高20公分　四川成都保和鄉張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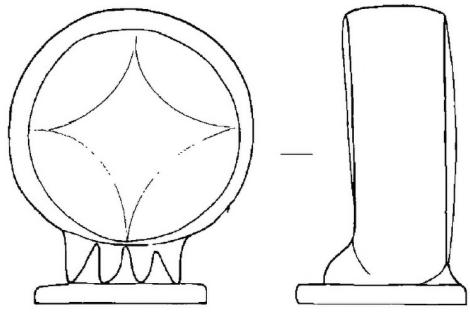


圖25　陶鼓　北宋　高16公分　四川成都保和鄉張氏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6 醬釉陶獸 北宋 高11.5公分 四川北川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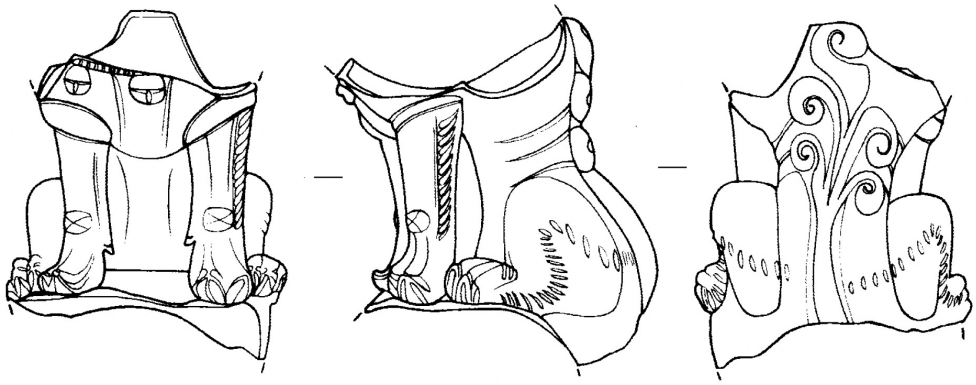


圖27 陶獅 923年 高9.6公分 四川成都前蜀魏王王宗侃夫婦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8　劉起墓室之「南方赤帝八天薦拔劉起真文」　1094年
長39.5、寬38公分、厚2.6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夫婦墓出土



圖29　張氏墓室之「東方八天煉度薦拔鎮墓真文」　1099年
長40、寬36.5公分、厚2.4公分　四川成都劉起夫婦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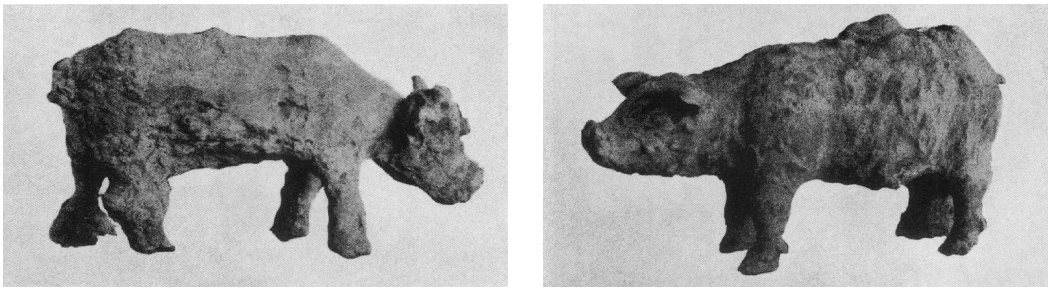


圖30 鐵牛與鐵豬 918年 鐵牛長74，高32公分，重60公斤，鐵豬長66，高32公分
四川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



圖31 黑陶儀仗俑 1275年 高32-34公分 陝西西安劉元振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omb Figurin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n *Mingqi:* Origins of Sichuan Burial Practices

Hsu, Ya-h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ingqi is a distinctive Chinese category of burial objects that originated in classical ritual texts and was continually regulated by sumptuary law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Pottery tomb figurine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ypes of *mingqi*, including the famous three-color glazed *sancai*, which marked the superior status of tomb owners and flourished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These pottery figurines, however, experienced a sharp decline in the ninth century.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burials across North China, suggesting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use of *mingqi*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excavated Song tombs reveals that, while pottery figurines were absent in tombs from North China, they continued to appear in Sichuan, Jiangxi, and Fujian. Notably, many figurines from Sichuan were coated with *sancai* glaze, making it a major center for *mingqi* pottery figurines during the So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Sichuan played in burial culture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by examining tomb figurines and other burial objects, particularly tomb-quelling stones bearing Daoist talismanic inscriptions used in Sichuan during the Song period.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mingqi* burial culture after the ninth century and considers how recurrent waves of immigrants from Chang'an, as recorded in tomb owners' epitaphs, contributed to the shaping and reshaping of layered burial customs in Sichuan.

Keywords: *mingqi* pottery figurine, tomb-quelling stone, land deed, epitaph, Tang-Song transi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